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吳佩珍教授

「不安」與「流離」：

試探真杉靜枝、中山侑、龜田惠美子的「灣生」書寫

“Anxiety” and “Diaspora” : A Study of Masugi
Shizue , Nakayama Susumu , and Kameda Emiko’ s
“Wansei” Writings

研究生：周嘉俊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一月

謝辭

研究所的階段即將步入尾聲，能夠完成這本論文，一路上仰賴許多老師及朋友們的協助。

首先，非常感謝引領我進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吳佩珍老師。老師在課堂的指導與對於研究的熱忱，都拓展我在文學領域的視野。在撰寫論文的期間，老師始終包容我的錯誤，耐心地引導我一步一步成長。老師對於我的關懷與鼓勵，也使我能夠度過數次遭遇過的自我懷疑與挫折，向前邁進。感謝陳芳明老師的台灣文學史帶領我進入台灣文學研究的大門。修課期間，感謝崔末順老師在史料學與文本解讀的指導，讓我對於戰前至戰後的台灣文學都能夠有進一步的認識。老師在知識上展現的廣度與深度都讓我敬佩不已。感謝紀大偉老師在論文寫作的指導。老師不僅讓我對於理論有初步的認識，對於論文的架構與書寫上也能夠有基本的掌握。感謝曾士榮老師在日記與英文資料的閱讀上給予的訓練。感謝慧玲助教給予我的種種提醒與幫助，讓我在研究所的求學過程中更加順利。在撰寫論文的階段，感謝曾給予我寶貴意見的星名宏修老師與阮斐娜老師。兩位老師的意見都激發了我對於論文主題的思考。最後感謝兩位口考委員林雪星老師與鳳氣至純平老師。兩位老師細緻的閱讀與精準的評析都使這本論文能夠更加完善，也使我發現撰寫論文時未能注意的地方。

感謝政大台文所的學長姐與同學們的陪伴與協助。特別感謝詩勤學姐、宗佑學長、子萍學姐在研究的道路上曾給予我的啟發與鼓勵。感謝曾一起奮鬥的同學們：偉誌、國勳、雪瀾、文彬、子翔、博凱、進強、鎰葳、亭儀、令潔、惠方。感謝讀書會的夥伴孟儒、冠穎、珮瑜。謝謝你們。

最後，感謝一路以來在背後支持我的家人們。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與陪伴，這個階段不會如此順利。

2022年1月於中和

「不安」與「流離」：

試探真杉靜枝、中山侑、龜田惠美子的「灣生」書寫

摘要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三位作家：真杉靜枝（1901-1955）、中山侑（1909-1959）、龜田惠美子（1921-2014）的「灣生書寫」為中心，討論「灣生」試圖在台灣建立「歸屬感」的過程裡呈現的「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首先，藉由擴大「灣生」的定義，在探討「灣生書寫」時得以涵蓋更多與「殖民地台灣」緊密連結的日人作家。接著，透過分析三人的「灣生書寫」，闡明「灣生」是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說的「中介者」（in-between）的存在，其文化主體具有超越內地／本島二元對立圖式的「混雜性」（hybridity）。儘管「殖民地台灣」在整個日本帝國的構圖是「他者」的存在，但是卻承載著「灣生」對於家人／殖民地文化／土地的連結。從三人的「灣生書寫」中，可以看出「灣生認同」的形成與日本近代國家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從戰前至戰後，從宗主國至殖民地，從 1900 出生的世代至 1920 出生的世代，都影響到「灣生書寫」裡呈現的「不安」與「流離」。相較於前行研究對於「鄉愁」與「土地認同」之強調，本論文目的在於突顯「灣生書寫」重層化的面向。

關鍵詞：灣生、灣生認同、離散、真杉靜枝、中山侑、龜田惠美子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回顧.....	13
第四節 章節架構.....	23
第二章「宗主國」的「局外人」：真杉靜枝小說裡的「灣生」困境.....	24
前言.....	24
第一節 「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小說〈雛雞〉.....	27
第二節 「南進政策」下的重責與艱困：小說〈烏秋〉.....	31
第三節 「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隨筆集《無謂的振翅》.....	36
小結.....	39
第三章「未竟的志業」：中山侑的理想與阻礙.....	41
前言.....	41
第一節 作為「外來者」的「不安」：中山侑的早年活動.....	45
第二節 建設「台灣」文化的困境與動力：小說〈抗議〉.....	51
第三節 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劇本〈客廳〉.....	55
小結.....	59
第四章 尋根之旅：戰前至戰後龜田惠美子的台灣「鄉愁」.....	61
前言.....	61
第一節 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1921-2014）生平.....	63
第二節 介於「故鄉」之間：〈故鄉寒冷〉.....	64
第三節 「台灣」記憶的重構：《旅の朝》的台灣書寫.....	70
第五章 結論.....	78
參考資料（按姓氏筆畫排列）.....	84
附錄 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年表（1921-2014）.....	9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日治時期文學研究中作為「殖民者」的在台日人作家經常成為被忽略的對象。而當研究者論及在台日人作家集團時，亦常常基於民族主義的觀點，強調台灣人作家的抗日意識與日本人作家的殖民意識。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過度簡化在台日人集團內部的複雜性，也忽略作為近代國民國家「日本」內部的異質性。¹「灣生」作為「日本人」，不可否認在殖民地台灣是「殖民者」。然而，若只是依據民族觀點來審視「灣生」，容易忽略「灣生」本身所處的特殊文化位置。「灣生」是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說的「中介者」（in-between）的存在，其文化主體具有超越內地／本島二元對立圖式的「混雜性」（hybridity）。²同時，研究者以今日之眼回顧當時的殖民情境時，如駒込武指出：「不論是對「日本人」或是對所有的人群團體，都不應一開始就套上「非道德性」的本質主義解釋。毋寧說，在特定權力關係的磁場之間，被統治者被羞辱，被非人化

^{*}本論文引用的日文史料優先使用現有的中譯本，無中譯者則皆為筆者自譯，並經由吳佩珍老師的悉心指正，謹此致謝。若有誤譯或誤植之處，概由筆者負責。

¹吳佩珍分析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明治維新史的定位，與其在台灣生成的傳說與形象後指出：「後殖民研究論述上過度單純化日本近代的『國族主義』，對日本領台五十年間在台日人的文學框架建構，基本上均視為以日本宗主國為主體的『勝者』史觀的『國民文學』，「而在台日人的國族認同，並無法如此單純地還原還未具體成形及充滿曖昧矛盾的『日本』。他們所欲建構的『外地文學』未必等於『日本文學』」。以上參見吳佩珍，〈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4），頁134-135。相關可再參考吳佩珍，〈日人作家的「文學史觀」疑義〉，《聯合文學》328期（2012.2），頁49。

²吳佩珍的真杉靜枝研究指出，真杉靜枝身為中介「中介者台灣」的代言人，其文本中的聲音正如代言的台灣，被寄予扮演戰爭協力的角色。而真杉靜枝亦藉由積極扮演戰爭協力者所爭取的籌碼，對帝國的台灣政策同時進行批判。以上參見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90。筆者在本論文欲延伸並擴大此觀點，認為這種「中介者」（in-between）不僅不限於真杉靜枝，也可以在其他「灣生」作家及其作品見到。

的同時，也必須在不同的意義下，去正視統治者也被非人化的情況」³。故本論文嘗試跳脫以本質性的民族角度來探討「灣生書寫」的問題。

何謂「灣生書寫」？「灣生書寫」的意涵為何？要探討這個問題前，必須先追問：「灣生」如何界定？「灣生認同」是否存在？這個問題，至今為止台灣不管文學界或史學界都已累積相當程度的成果。前行研究大多將「灣生」指涉的對象限於「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日本人」，並探討「灣生」身分及經驗對其研究對象產生的意義與影響。⁴然而，若僅以「出生地」界定是否為「灣生」似乎過於簡化，難以看出「灣生」與「非灣生」的區別。因此，以鳳氣至純平的研究為代表，將「灣生」指涉的對象擴大至「準灣生」（出生於宗主國而年少時期生活於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⁵，以是否具有「灣生認同」來斷定「灣生」。也就是說，「灣生」並非本質性的存在，而是「後天」受到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本地文化的交互影響後逐漸產生。隨著「灣生」定義的擴大，本論文在探討「灣生書寫」時得以涵蓋更多與「殖民地台灣」緊密連結的日人作家。關於「灣生認同」，鳳氣至純平指出以下兩點：第一，「灣生」一方面作為支配者君臨殖民地，另一方面被母國人民質疑「標準日語」的能力，產生「自卑感且加深對於被殖民者的優越感」。第二，比起內地，「灣生」對於自己出生或成長的台灣有更大的關懷，「從早期對內地的憧憬轉變為後來發覺自己的故鄉是台灣」。⁶其中，特別是「灣生」的「故鄉意識」，或「灣生」對於台灣的

³駒込武，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台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頁160。

⁴近10年的「灣生」研究整理如下：例如林慧君關於新垣宏一的研究〈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台灣文學學報》16期（2010.6），頁85-112；吳曉恬關於立石鐵臣的學位論文《殖民間隙裡的糾葛與記憶：以立石鐵臣的創作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6年）；蔡知臻關於鈴木怜子的學位論文《灣生的記憶與認同：以鈴木怜子及〈南風如歌〉為探討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18年）。

⁵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4。

⁶同前註，頁120。

「鄉土認同」，成為諸多先行研究者進行「灣生」研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⁷然而，「灣生認同」只限於「故鄉意識」嗎？若要檢視「灣生書寫」，只憑這點顯然不夠。⁸「灣生書寫」裡「鄉愁」的探討，先行研究已累積大量成果。但是，若過於片面強調「灣生」「鄉愁」的情感，除了容易淡化當時日本帝國內部「宗主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從屬關係間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外，也難以凸顯「灣生」身處的特殊文化位置所扮演的「中介者」(in-between) 角色。故本論文試圖呈現「灣生書寫」除了「鄉愁」外，仍有其他值得探討的議題。

在細究「灣生書寫」前，關於「灣生」還需釐清以下問題：作為「日本人」的「灣生」為何被稱作「灣生」？「灣生」一詞出現的脈絡為何？「灣生」是如何被「母國日本人」差異化？回顧戰前「灣生」一詞的產生，是具有歧視的意味。即使是戰後，出生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竹中信子曾指出：

⁷依發表時間順序來看，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的結語指出：「相對於大部分殖民者第一代在與『內地』的關聯中定義自己存在的價值，『灣生』卻開始在自己所生所長的故鄉『內地』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台北市：玉山，2007年)，頁295；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強調「故鄉意識」的流動性質，透過史料與回憶錄的仔細爬梳比較戰前在台日人第一代，與戰前至戰後第二代「故鄉意識」的轉折過程。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縣：稻鄉，2008年)，頁173-217；林慧君在〈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指出造成「灣生」產生身分動搖的原因在於無法直接認同自己出生、成長的殖民地台灣為故鄉。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1期(2009.8)，頁56-61；林初梅在〈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台灣學童的日本認同〉還原日治時期「灣生」兒童在當時受到學校教育來探討「灣生」族群對台灣鄉土認同的形成根源。林初梅，〈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台灣學童的日本認同〉，《台灣學通訊》93期(2016.5)，頁20-21。

⁸關於這點，鳳氣至純平在博士論文亦試圖將「灣生」從「鄉愁」解放，替「灣生」找到適當的位置。他以在台日人所寫的「台灣歷史」為研究對象，為在台日人(包括灣生)找到其在本日本帝國、殖民地台灣適當的位置，用「他們所寫的台灣史」為視角，思考他們的位置，以及他們與台灣、台灣人的距離、互動關係。以上可詳見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市：南天書局，2020年)。

「灣生」在我那個時代，是一個活的詞彙。相對於日本國內出生長大的人，這個詞彙用來指稱在臺灣長大出生的人。因此，在臺灣出生，於終戰隔年撤回日本的我，也就是所謂的「灣生」。由於一般人有殖民地比不上母國的想法，因此冠上「灣」字的，被認為屬於較低層次，例如灣官、灣製、灣紳、灣記者、灣商、灣風呂、灣妻等，不勝枚舉。⁹

由此可見，「灣生」作為「日本人」、「殖民者」，卻具有「不如宗主國出生的日本人」的意涵，原因與「灣生」和「殖民地台灣」深厚的連結有關。為了探討「灣生」被「母國日本人」差異化的問題，本論文以班納提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南美歐裔海外移民研究作為參考。安德森指出這些歐裔海外移民後來組成的國家與反抗的對象是「使用相同語言、擁有相同血統」。¹⁰這些人受到母國人的歧視，以及在官員仕途的「朝聖之旅」受到阻礙，政治地位有低於母國人的現象。¹¹然而，究竟為何造成如此現象？安德森認為從君主的角度來看，這些歐裔海外移民的人數不斷增加，在地方扎根越來越深，「原則上他們已經掌握了現成的，足以成功地主張自己權力的政治、文化和軍事的手段」¹²，這些都構成對於母國的威脅。君主為了避免這個威脅，便派遣母國出身的官員擔任總督。這些歐裔海外移民對於母國而言，「經濟上，他們必須被置於從屬地位並且加以剝削，但是他們對於帝國的穩定也非常重要」¹³。除了君主對於殖民地的防範之外，啟蒙運

⁹竹中信子，蔡龍保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台北市：時報文化，2007年），頁99。

¹⁰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台北市：時報文化，2010年），頁93。

¹¹同前註，頁101。

¹²同前註，頁102。

¹³同前註，頁102。

動亦影響母國人和歐裔海外移民間重大的區別。安德森指出盧梭與赫德主張氣候和生態對文化與性格具有構成性影響的著作，發揮廣大的影響力。在此影響下，「人們非常容易就會做出方便而庸俗的推論，認為歐裔海外移民由於出生在地球上野蠻未開的這一半，本性就有異於一並且低劣於一母國人，因此也就不適於擔任較高的公職」¹⁴。這種主張氣候和生態對文化與性格具有構成性影響的殖民論述，雖然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有類似的情況，但脈絡稍有不同。台灣當時是作為日本帝國近代第一個，也是接近熱帶地區的殖民地。然而，日本統治台灣後，雖然引進歐洲人的熱帶殖民經驗，卻在實行的過程裡遇見矛盾：那就是為了確保日本人能夠健康地移住殖民地，必須加強熱帶風土馴化；但同時，若日本人適應熱帶風土也代表身體特質的「退化」。關於日本如何試圖解決這個問題，范燕秋的研究成果可供本論文參考。范燕秋指出總督府透過小學校及公學校學生身體檢查制度，監測兩者發育的概況，與文部省公布的標準比較後，以生物統計的科學數據得出以下結論：由於熱帶氣候對學童發育不利，故在台日人體格較內地學生低劣，但又比台人子弟優秀。而這項調查成果經總督府認定為在台日人「風土馴化」的基準。¹⁵然而，面對這樣的結果，我們應如何看待？殖民醫學史專家大衛·阿諾（David Arnold）告訴我們必須注意醫學與殖民主義間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史的緊密結合。¹⁶安德森亦指出殖民政府認為殖民地的一切都是可被量化且控制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者出現前，殖民政府其實已提供這個民族可能被想像的模樣。¹⁷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在統治台

¹⁴同前註，頁 104。

¹⁵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7 期，（2005.03），頁 114-118。

¹⁶David Arnold，蔣竹山譯，劉士永、傅大為校訂，〈醫學與殖民主義〉，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群學，2004 年），頁 185。

¹⁷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台北市：時報文化，2010 年），頁 231-232。

灣初期就已定下殖民地／宗主國的從屬關係。同時，為了正當化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正當性，透過「風土馴化」的成果，建構出「母國日本人」優於「在台日本人」優於「本島人」這樣的圖示。此後，殖民地台灣帶有的「熱帶」意象，也成為「在台日人」與「母國日本人」產生差異的記號。

在釐清「灣生」產生的脈絡與涵義後，接下來我們還必須追問：出身「殖民地台灣」具有的「特殊性」，也就是「灣生」的身分，是否會實質影響到「灣生」個人對於自我定位的迷茫？事實上是有的。戰前《民俗台灣》的金關丈夫（1897-1983）曾以蓬頭兒的筆名點出「灣生」的反抗意識：

儘管自己來台灣已經將近六、七年，但直到最近，在接觸各式各樣的人過程中才開始察覺。那就是不僅本島人，連在台灣出生的內地人，都伴隨一種像是「灣生」這樣蔑稱的眼光被看待。另外，那群人〔筆者註：台灣出生的內地人〕之間似乎存在著對此產生的一種像是「灣生意識」。而且這個所謂「灣生」的反抗意識好像相當強烈。沖繩縣人和一般內地人間，在台灣似乎也存在著類似這樣的關係。¹⁸

金關丈夫透過親眼所見，以「沖繩縣人」與「一般內地人」的關係來比擬「灣生」與「一般內地人」的關係。這樣的看法與日本帝國統合的過程有關。阮斐娜指出日本的殖民主義既不是始於台灣也不是始於韓國，在檢視日本殖民主義時，常會忽略艾努人或沖繩人，但日本早在 19 世紀開始擴展其近代的殖民地

¹⁸蓬頭兒，〈點心〉，《民俗台灣》3卷2號，1943年2月5日，頁28。原文：「自分は台湾に来て六七年になるが、近頃になっていろいろな人に接しているうちに始めて判ったことがある。それは本島人のみならず、台湾生まれの内地人が、「灣生」の如き一種の蔑稱を伴ふ眼で見られ、またそれに対する一の反應から来る「灣生意識」の如きものがそれらの人々の間に存在しているらしいと云ふことである。そしてこの所謂「灣生」の反抗的意識は相當に強くものであるらしい。沖繩縣人と一般内地人との間にも台湾に於いては何かこれに似た關係があるやうである」。

時，幾乎是同時向北以及向南入侵上述民族所居住的區域。而 1879 年琉球正式設縣，也象徵日本文化融合以及南方的直接統治開始。¹⁹而在金關丈夫提出前述的看法之前，也就是 1940 年，日本中央、沖繩縣廳與沖繩的地方媒體剛經歷「沖繩方言論爭」。小熊英二曾對論爭過程詳細梳理，並定位成「認為沖繩還不夠『日本人』的一方」與「認為沖繩已經『夠日本』的一方」。²⁰這場論爭，沖繩方面的投書者關注的是提升自己生活水準與消除歧視，對於從「日本人」當中被排除出去這件事是很恐懼的。他們覺得自己同化成「日本人」的程度還不夠，只要有差異就不會被認同為「日本人」，而不被認同為「日本人」就會遭到歧視。²¹這個差異或許是如民藝協會最後對這場論爭的見解：「沖繩縣民因為自身擁有的鄉土要素，經常遭到其他府縣的人誤解，視為異族」，「人們莫不認為，將這種鄉土文化的臭氣盡早一掃而空，是振興沖繩唯一的道路」²²。然而，雖然金關丈夫以「沖繩縣人」的處境來對比「灣生」的處境，但「沖繩」和「殖民地台灣」畢竟是不同的情況。駒込武曾指出沖繩作為「內地」與台灣作為「外地」的緣由有三。第一，憲法公布時是否為領土。1897 年當時的台灣總督乃木希典主張：受到憲法保障權利的臣民僅限於有歷史關係的人民，不包含憲法頒布後因征服或割讓而獲得土地。第二，當時明治天皇曾親自坐鎮廣島大本營指揮日清戰爭。台灣是透過與清朝這個具有相對於「日本」的「外」部性格的王朝發生戰爭後才領有。第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於台灣的征戰過程。這與原先和平接收台灣的預想相反，更加深「日本」「外征」的意識。²³總而言

¹⁹阮斐娜 (Faye Yuan Kleeman)，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臺北市：麥田，2010 年），頁 34-35。

²⁰小熊英二，黃耀進、鄭天恩譯，《「日本人」的界線：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新北市：聯經，2020 年），頁 345。

²¹同前註，頁 343。

²²同前註，頁 345。

²³駒込武，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7 年），頁 37-40。

之，駒込武認為沖繩與台灣的不同，是因為「兩者對以天皇為媒介之「共感的共同體」的歸屬意識滲透程度不同所導致」²⁴。儘管沖繩縣人沒有受到與母國日本人等值的權利及義務，但從國家統合的層面來看，沖繩仍屬於「內地」，與作為「外地」（殖民地）的台灣性質不同。故「灣生」對於「殖民地台灣」本身帶有的「他者」異質成分，以及害怕從「日本人」當中被排除的焦慮，可能更甚於「沖繩縣人」。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灣生認同」的形成必定具備兩樣條件：一為「日本人」的身分，二為與帶有帝國「他者」性質的「殖民地台灣」深厚的連結。在日本帝國劃出「殖民地台灣」與「宗主國」的從屬關係下，「灣生」自然成為介於「母國日本人」與「本島人」間的存在。故「灣生」作為「殖民地出身」的「日本人」，對「殖民地台灣」的情感是由「不安」(Anxiety)與「流離」(Diaspora)共同構成。「不安」(Anxiety)除了來自「殖民地台灣」相異於「宗主國」的風土、民情與佔據多數的異民族外，還有害怕自己從「日本人」當中被排除的焦慮。然而，儘管「灣生」意識到「殖民地台灣」在日本帝國的「他者」性質，卻仍無法割捨自己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因為「殖民地台灣」同時也是「灣生」成長的「根」，承載「灣生」對於「家人」、「殖民地文化」與「土地」的記憶，使「灣生」產生「流離」(Diaspora)的情感。「灣生」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與矛盾在「灣生書寫」具有閱讀的可能性。故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是在「灣生書寫」觀察「灣生」在宗主國／殖民地台灣間思考與找尋自我定位的過程。本論文欲強調「灣生」試圖在「殖民地台灣」建立「歸屬感」的過程，特別是「灣生」對於「殖民地台灣」的「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若能透過「灣生書寫」來理解「灣生」尋找自我定位時的矛盾與糾結，除了可以看見「在台日人文學」不同的面向外，也得以重新檢視過去常被忽略的「殖民者」視點。

²⁴同前註，頁 4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首先，為理解「灣生」本身所處的特殊文化位置以及「灣生認同」的定位，本論文擬以三位後殖民理論代表性的批評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霍米·巴巴（Homi Bhabha）、酒井直樹的論述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以下將依序爬梳從三位學者的理論深受啟發的重點：

（一）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

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聚焦於殖民情境下，被殖民者的外觀和內心的矛盾。他質疑殖民者白人預設白種文明的優越、普遍性的秩序。書中提到：

所有被殖民者—換句話說，所有因為當地文化的原初性被埋葬而產生自卑情結的人—都得面對開化者國家的語言，也就是母國的文化。隨著學習母國的文化價值，被殖民者將更加遠離他的叢林。當他拒絕他的黑，拒絕他的叢林，他會更加的白。²⁵

法農描述一位黑人從母國返回老家後只用法語表達，因為要強調「從此產生的斷裂」²⁶。然而，即使黑人使用的語言、腔調和文化思維都與白人相同，原來的膚色終究無法改變，最後落入不被白人族群與原生族群認可的尷尬處境。法農指出這樣的文化主體呈現「覺得自己被排拒、無所安身……作為『他者』，就是覺得自己總在不穩定的位置上，處於警戒狀態，隨時準備被拋棄」²⁷的心理狀

²⁵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年），頁 89。

²⁶ 同前註，頁 108。

²⁷ 同前註，頁 156。

態。對此，法農認為黑人在殖民情境下逐漸喪失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當黑人接觸到白人世界時，會發生某種敏感化作用。如果心理結構脆弱的话，就會出現自我的坍塌。黑人停止作為**主動的**個體來行事。他的行動目標將是（以白人形式出現）**他人**，因為只有**他人**能賦予他價值。²⁸

身處殖民情境的被殖民者黑人，只能在黑皮膚代表的「野蠻」及白面具代表的「文明」間不斷分裂。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是後殖民理論的先驅。儘管身為「被殖民者」的「黑人」與身為「殖民者」的「灣生」不能等同而語，但法農提出殖民情境下主體的不穩定和文化混雜仍然是本論文值得參考的面向。

（二）霍米·巴巴（Homi Bhabha）

巴巴的《文化的定位》聚焦在文化的差異性，強調主體身分的位置無法以傳統本質性的項目（例如階級、性別、民族）來概括。巴巴認為主體身分不可能是穩定的，必定包含各種民族性、文化和社會互相協商的過程，是不完整且雙重（doubling）的狀態：一方面是身體或本能的直覺，另一方面是認同之處。²⁹因此，巴巴提出「中介者」（in-between）的位置，認為此處是讓充滿各種差異與矛盾的主體身分能夠不斷協商的新地點，並且能觀察到主體身分表述的過程。³⁰基於這樣的角度，巴巴重新解讀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巴巴指出殖民／被殖民雙方主體的認同都是從看／聽／讀的文本形成，是透過彼此視線的交換所建構出的權力關係。³¹雙方認同的對象都不是現實的「黑人」，而是被白人想像的「黑人性」。這個「黑人性」如同法農書中所說：「黑人在任何方面都

²⁸同前註，頁 250。

²⁹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51-52。

³⁰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

³¹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76。

像是白人自己那焦躁自我的反面」³²。雙方面對這個「黑人性」時，法農說道：「黑人因為他的自卑而成為奴隸，白人因為他的優越感而成為奴隸」³³。白人透過「黑人性」可以確認統治正當性，黑人透過「黑人性」則逃離自己種族，戴上「白面具」。然而，巴巴認為成為「黑皮膚，白面具」的文化主體已經具有「混雜性」(hybridity)，離殖民者／被殖民者都有一段距離，應該要放在「中介者」(in-between)的位置。此時，位於「中介者」(in-between)的「黑皮膚，白面具」的文化主體具有的「混雜性」(hybridity)否定任何純粹性的認同，模糊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邊界。³⁴

(三) 酒井直樹

酒井直樹探討所謂「日本文化」、「日本人」概念化的過程。酒井直樹指出近代國民國家的統一體是想像出來的，是透過對「他者」的反照而產生。即使是再均質化的社會，都無法否認內部習慣和風俗的差異性。³⁵「日本文化」的假想的統一性是在近代歷史才確立的。「日語」、「日本文化」、「日本國民」這三個統一性似乎可以完全互換地加以運用。日本的文化是靠日本語言的同一性為參照而被確認，日本語言是靠日本人民的國民同一性為參照而被確認，日本人民是由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的傳統而被確認。³⁶酒井直樹在此前提下，提出對於「同化」與「本質論的文化主義」的質疑。他認為這兩者必然是在多數者和少

³² 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年)，頁 269。

³³ 同前註，頁 136。

³⁴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12。

³⁵ 酒井直樹，〈序論—ナショナリティと母(国)語の政治〉，酒井直樹、巴里 (バリー・ブレット・ド)、伊豫谷登士翁編，《ナショナリティの脱構築》(東京都：柏書房株式會社，2003年)，頁 44、46。

³⁶ 酒井直樹，〈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期，(1998.6)，頁 217-218。

數者雙方的不安，與對於民族同一性的執著相互促進下誕生的。³⁷

由於三位批評家提出的後殖民研究理論出自不同的歷史與地緣的脈絡，因此在沿用時必須謹慎小心。法農指出殖民情境下的文化主體並非只用族群認同就輕易概括，而是具有矛盾性與混雜的面向。巴巴進一步指出殖民者／被殖民者的界線並非二元對立，而是交互影響。介於兩者間的「中介者」(in-between) 具有的「混雜性」(hybridity)，產生解構宗主國文化霸權的可能。酒井直樹對於「本質論文化主義」的質疑，也襯托所謂「日本文化」、「日本人」內部的多樣性。這三位批評家的理論都試圖超越二元對立的思考，意在解構殖民文化佔據的霸權地位。從巴巴的理論出發思考「灣生」、「灣生認同」，本論文並不認為「灣生」是穩定而本質的主體，而是當作在當時殖民情境下的宗主國日本／殖民地台灣的邊界不斷協商而形成的文化主體，是處於「中介者」(in-between) 的位置。而「灣生認同」受到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本地文化的影響，具有的「混雜性」(hybridity) 並非僅用「殖民者認同」就能概括。而從酒井直樹理論的角度來閱讀「灣生書寫」，除了可以重新思考在台日人文學內部的多樣性外，也可以反思「日本語」、「日本人」、「日本文學」的概念不應該只是停留於「宗主國的」這種單面思考。這些思考方式有助於本論文釐清「灣生」、「灣生認同」、「灣生書寫」的定位。

³⁷酒井直樹，〈序論—ナショナリティと母（国）語の政治〉，酒井直樹、巴里（バリー・ブレット・ド）、伊豫谷登士翁編，《ナショナリティの脱構築》（東京都：柏書房株式會社，2003年），頁4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回顧

由於本論文主要關注「灣生」作為「中介者」(in-between)的身分，並爬梳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的框架裡「灣生」所處的特殊文化位置。故在研究對象與作品的選取上，必須注意作家在視點上是否可能具有介於「宗主國文化」與「殖民地本地文化」間的「混雜性」(hybridity)。這個「混雜性」的出現必定與作家「後天」生活於「宗主國」與「殖民地台灣」的雙重經驗相關。有了與「母國日本人」的比較視點後，「灣生」具有的「差異性」才能凸顯。因此，若一位出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始終未離開過「殖民地台灣」，或未離開過「在地日人」的共同體，是難以察覺這個「差異性」的。而「灣生書寫」裡「不安」與「流離」的情感，不僅會隨著「灣生」個人處境的相異，也會根據其奠基於不同的人、事、物而產生相異面向。本論文為呈現「灣生書寫」的重層化面向，欲聚焦三位作家：活躍於「宗主國」文壇的真杉靜枝（1901-1955）、出生成長於「殖民地台灣」與日後積極參加文化運動的中山侑（1909-1959）、足跡橫跨戰前至戰後的龜田惠美子（1921-2014）。這三位作家在作品裡不僅皆展現對於「殖民地出身」認同與矛盾的態度，視點亦呈現「中介者」(in-between)具有的「混雜性」(hybridity)。並且，這三位作家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兩地間摸索自我定位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與「殖民地台灣」的連結，且方法各有不同。無論是透過居住於台灣的家人，或是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想像，甚至是自己身體的經驗，皆反映這三位作家試圖在「殖民地台灣」建立「歸屬感」的意圖，並且過程是歷經一番曲折。因此，這三位作家不僅在「灣生書寫」系譜的建構上保有彼此對話的空間，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亦存有補充與延伸的可能。以下將進一步說明這三位作家及作品意義：

（一）真杉靜枝（1901-1955）

以往的「灣生」研究並不會將真杉靜枝當作研究對象。然而，若觀察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可以發現其中確實呈現「灣生」「不安」與「流離」情感。這或許與真杉靜枝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並長期定居「宗主國」，並於「宗主國」文壇面對廣大的讀者群的經歷相關。若僅聚焦於真杉靜枝作為「殖民者」、「日本人」身分的話³⁸，除了可能忽略真杉靜枝小說與隨筆不同於「母國日本人」的異質成分外，也容易淡化「殖民地出身」的背景對其書寫造成的影響。而若以「準灣生」（出生於宗主國而年少時期生活於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的角度來閱讀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的話，雖然能夠凸顯其作品呈現的語言、人種、文化的混種性要素³⁹，卻難以呈現真杉靜枝對於自己「殖民地出身」的認同與矛盾。故本論文擬將真杉靜枝定位為介於「母國日本人」與「灣生」間的「中介者」（in-between）位置，試圖閱讀真杉靜枝書寫裡含有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

若我們觀看戰後日本文壇其他作家在書寫以真杉靜枝為原型的小說或傳記時，可以發現其中惡意的人身攻擊大多是針對「她這個人」而非「她的作品」。這個現象不僅與真杉靜枝的「女性」身分⁴⁰有關，還有其「殖民地台灣」的出

³⁸李文茹在博士論文指出真杉靜枝觀察對象的轉變，認為作為「內地人」的真杉靜枝與作為「他者」的「被殖民者」的界線被明白地畫出。而真杉靜枝把「殖民地台灣」作為「他者」觀察的同時，也在進行自己作為「日本人」的確認。李文茹，《帝国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年），頁31、33。關於李文茹對於真杉靜枝作品的研究，可詳見李文茹，《帝国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年）。其中的第一章、第六章先後改寫為：李文茹，〈植民地を語る苦痛と快樂—台湾と日本のはざまにおける真杉静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日本台湾学会報》5號（2003.5），頁42-63；李文茹，〈殖民地・戦争・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06），頁63-79。

³⁹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11。

⁴⁰吳佩珍指出真杉靜枝的傳記對於真杉靜枝形象的形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例如石川達三〈花の浮き草〉以男性「性道德」標準將真杉靜枝妖魔化為「惡女」的形象，並且在《讀賣新聞》敘

身背景。這些作家刻意地將真杉靜枝身上的外觀（黝黑皮膚、豐滿）與個性（放浪）和地理上的「殖民地台灣」作連結⁴¹，都證明真杉靜枝個人及作品與「殖民地出身」是具有密切的關係。而「殖民地台灣」對於活躍於「宗主國」文壇的真杉靜枝而言，一直是帶有複雜情感的記號。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真杉靜枝開始在作品裡加強自己與「殖民地台灣」的聯繫。即使如此，真杉靜枝仍刻意隱瞞「殖民地台灣」的成長經歷，只強調「宗主國」出身，反映其對於「殖民地出身」的「不安」。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並非皆是直接描寫「殖民地台灣」，許多是以描寫居住於「殖民地台灣」的家人為主。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極大的部分是來自於自己的家人。⁴²而除了先行研究聚焦的雙親之外，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妹妹勝代與出生並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外甥分別具有的「準灣生」與「灣生」形象亦是值得關注的對象。

述自己的寫作動機時，展現對真杉靜枝的「偷窺趣味」。而林真理子《女文士》雖然參照真杉靜枝同時期作家的論述，但基本上仍不離火野葦平、石川達三等男性作家「暴露趣味」的基調。以上參見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 年），頁 7。

⁴¹阮斐娜、垂水千惠皆指出戰後關於真杉靜枝的評論都強調其在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阮斐娜認為這些評論真杉靜枝的論述：火野葦平〈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石川達三〈花の浮き草〉、巖谷大四《物語女流文壇史・下》、林真理子《女文士》都出現文化與種族的落差，反映內地和殖民地間的分歧。垂水千惠則認為這些描寫真杉靜枝的傳記：火野葦平〈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石川達三《花の浮き草》、林真理子《女文士》皆透過「真杉靜枝」這個身體再現了「台灣」的意象。例如〈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中並沒有提到真杉靜枝晚年行為怪異的行為是因為服用過多的藥物，而是將「放浪」的形象歸咎於真杉靜枝早年在殖民地台灣的婚姻失敗。而《女文士》則是把真杉靜枝豐滿的身材與殖民地台灣「食物豐饒」的南國形象做連結。以上分別參照兩篇論文：阮斐娜，陳美靜譯，〈性別與現代性：日本台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李爽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87-132；垂水千惠，〈台湾という身体の「再現」－真杉静枝を書くということ〉，張季琳主編，《日本文学における台湾》（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 年），頁 41-62。

⁴²吳佩珍在分析自傳體小說〈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後指出「真杉將台灣稱為『第二故鄉』，其實正是與自己雙親臍帶相連的重要記號」。真杉靜枝從逃離母親的掌控遠離台灣，到再度返回台灣與母親的和解，都關係到「台灣」的形象在書寫的呈現。以上參見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 年），頁 34。

因此，在真杉靜枝作品的選擇上，本論文將以小說〈ひなどり〉⁴³（〈雛雞〉）（1938年）與〈烏秋〉⁴⁴（1941年）為例子，試圖探討真杉靜枝書寫裡呈現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這兩篇小說可以分別代表真杉靜枝返台前與返台後對於「殖民地出身」看法的轉變。她在1939年與中村地平一同返台之前，書寫的小說〈雛雞〉以自己迎接從殖民地台灣來到宗主國參加修學旅行的外甥為原型⁴⁵，主要透過女主人公縞代之眼，觀察作為「灣生」的外甥到「宗主國」參與修業旅行的過程。〈雛雞〉不僅表現真杉靜枝對於種族與文化差異凝視的察覺，覺得自己是「故鄉的陌生人」⁴⁶，也表現「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與「流離」的情感。〈雛雞〉所描述「灣生」的「不安」，不僅是因為伴隨「南方殖民地」與「暗黃色皮膚」而來的歧視，還包括對於「宗主國」的疏離感。然而，這次的修業旅行，無論對於外甥或是縞代而言皆具有特別的意義。對於外甥來說，伯母縞代對於自己的關愛，不僅使自己找到與「宗主國」的連結，同時亦找到消除「不安」的可能性。而對於縞代來說，這次旅行買到的「雛雞」，不僅寄託自己與外甥的親情，同時亦是與「殖民地台灣」的連結。不過，縞代並不確定這隻象徵自己與「殖民地台灣」連結的「雛雞」能否被春吉接受。當春吉表示自己喜歡這隻「雛雞」時，縞代心中的「不安」才終於卸下。就長期居住在「宗主國」的縞代而言，「雛雞」象徵的「殖民地台灣」不僅是自己「不安」的來源，同時亦是自己認同的所在。這部分的描寫反映真杉靜枝對「殖民地台灣」出身的矛盾情感。可以說，〈雛雞〉的女主人公縞代的「中

⁴³真杉靜枝，〈ひなどり〉，《ひなどり》（東京市：竹村書房，1939年），頁7-31。

⁴⁴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烏秋〉，《女性のみた近代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頁3-40。

⁴⁵吳佩珍指出〈雛雞〉改編自另一篇隨筆〈妹の子供〉（〈妹妹的孩子〉），敘述真杉迎接從殖民地台灣來到內地參加修學旅行的外甥的經過，表現成長於殖民地的真杉靜枝對於「人種」與「語言認同」的曖昧性（ambiguity）與混雜性（hybridity）。以上參見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186-187。

⁴⁶阮斐娜，陳美靜譯，〈性別與現代性：日本台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李爽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頁117。

介者」(in-between) 視點是介於「灣生」與「母國日本人」間。

真杉靜枝在返台後書寫的小說〈烏秋〉以自己的妹妹勝代作為小說人物照枝的原型。先行研究大多聚焦於照枝「未亡人」的身分，強調照枝作為女性、母親的堅強。⁴⁷本論文則聚焦於照枝作為「準灣生」與女人公八重視點上的差異。儘管八重認為自己是不同於因戰爭動員與南進政策來到台灣的「母國日本人」⁴⁸，但同樣透過描述與家人的相異，否認自己的「殖民地出身」。可以說，〈烏秋〉的女主人公八重的「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是介於「準灣生」與「母國日本人」間。〈烏秋〉呈現八重與照枝對於「皇民化運動」想法上的對比。擁有長期生活在「宗主國」經驗的八重知道，在「母國日本人」眼中，「殖民地台灣」具有的「在地性」不是透過「皇民化運動」就能輕易消除的。故八重認為實際推行「皇民化運動」政策的照枝肩負的任務是困難的。透過八重的觀察，〈烏秋〉裡「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實施，不管是會話課或本島青年參拜神社的畫面，盡是充滿「違和感」。然而，照枝身為公學校老師，不僅是「皇民化運動」的實際推行者，亦是「日本文化」與「本島文化」間的「中介者」。她與八重不同，照枝在〈烏秋〉的最後指出「皇民化」的軌跡可以從如今「本島人／本島文化」的轉化上看見。她不像八重認為「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是前進的阻力，反而認為「南進政策」賦予的「皇民化」責任是自己前進的動力。與姊姊八重有深厚情感的照枝，身處殖民地面對「在地性」時展現的自信，亦成為長期在「宗主國」生活的八重在面對自己「殖民地出身」時一

⁴⁷李文茹以當時國策文學的書寫脈絡出發，認為〈烏秋〉為呼應國策之作，指出「烏秋」代表的涵義：小型的烏秋都可以戰勝猛禽，所以日本也一定能戰勝領土廣大的中國。另一方面，透過照枝的堅強，「烏秋」亦代表守護戰場後訪社會的母親與女性們；吳佩珍認為「烏秋」隱喻的「不僅是台灣象徵的『中介者』形象，同時成為以照枝為例、生活於殖民地台灣的母親期待自己能堅強，同時身兼父職的象徵」。以上參見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06），頁75；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92。

⁴⁸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92。

股安定的力量。關於返台後的真杉靜枝，除了小說〈烏秋〉外，透過收錄於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調的振翅》）（1940年）的〈南方の雨〉（〈南方之雨〉）亦可以觀察到真杉靜枝作為「中介者」（in-between）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思考，還有面對「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她的「台灣認同」，是來自成長的「家」與居住於此的「家人」。

（二）中山侑（1909-1959）

中山侑在「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軌跡幾乎涵蓋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不論是1930年代的「新劇運動」，或1940年代的「皇民化運動」，皆可看見中山侑的身影。中山侑常被視為與本島人知識份子立場較接近的內地人，原因來自於其與本島人作家同屬《台灣文學》集團，及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西川滿（1908-1999）共同的抨擊。關於中山侑與本島人知識分子思想上的交集，先行研究大多從《台灣文學》偏向「左翼」的立場出發，聚焦於中山侑文學上的「寫實主義精神」及「藝術大眾化」的理念。⁴⁹然而，若僅以「左翼」的觀點思考中山侑在「殖民地台灣」從事的文化運動，可能容易淡化「殖民地台灣」出生與成長的背景對於中山侑的意義。

中山侑作為「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內地人」，不論是身處「異民族」佔據多數的「蕃地」裡，或是身處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宗主國」，都存在一種作為「外來者」的「不安」。他作為「理蕃警察」之子，從小在「蕃地」成長。「蕃人」帶來的「不安」，促使他產生對「近代」的嚮往及以文明／近代

⁴⁹中島利郎認為中山侑對西川滿文學觀的批判來自於「寫實主義精神」，與黃得時、楊雲萍等本島人作家並無不同，語調卻異常嚴厲。中島利郎，許佳璇譯，〈西川滿與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時代〉，《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頁333；鳳氣至純平以中山侑的「藝術大眾化」理念為主軸，認為中山侑在從事藝術活動時常注意到接受者的存在，與西川滿不同。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65、87。

「指導者」自居的心態。而他在赴日期間，不僅察覺到「接收者」與「在地性」的問題，還有作為「島民」文化落後的焦慮。返台後，雖然首次「新劇祭」的失敗凸顯他對於「殖民地台灣」認知的不足，但同時張維賢主持的「民烽劇團」帶給他極大的啟示。中山侑發現「文化轉譯」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灣生」的使命。他已認知「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建設不能只停留在「宗主國式的」，而是要具有融合「殖民地台灣」在地文化的「混雜性」。時至1937年戰爭爆發，「娛樂」的探討不只有「近代性」，還有「皇民化」的問題。此時的中山侑依舊強調「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並重視戲劇裡的「近代性」。這與當時的本島人知識份子張文環抱有類似的看法，或許兩人在理念上的契合促成1941年5月《台灣文學》的誕生。⁵⁰

關於中山侑的文本，先行研究討論最多的是中山侑在《台灣文學》發表的小說〈ある抗議〉⁵¹（〈抗議〉）（1941年）和劇本〈客間〉⁵²（〈客廳〉）（1942年）。中山侑在1941年書寫的小說〈抗議〉裡的人物皆是以自己和《台灣文學》同仁為原型。⁵³先行研究大多聚焦於中山侑與《台灣文學》同仁在思想上的交集。⁵⁴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本論文欲強調的是中山侑在〈抗議〉呈現其

⁵⁰關於《台灣文學》的創刊及文學理念，柳書琴指出：「是一批對西川滿及《文藝台灣》路線不滿的台、日人作家，利用大政翼贊運動扶持「地方文化」的機會，從《文藝台灣》脫退並另創《台灣文學》，企圖以本土現實主義文藝的復興別開生面」。以上參見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200。

⁵¹中山侑，〈ある抗議〉，《台灣文學》1卷1號（1941.5）。

⁵²第一幕：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頁213-226；第二幕、第三幕：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2號，1942年3月，頁106-125。

⁵³石婉舜在碩士論文指出〈抗議〉的登場人物社長蔡氏是以謝火爐為原型、劉君是以王井泉為原型、市會議員兼醫師的T氏是以陳逸松為原型、作家王崑山是以張文環為原型、七八年前在大稻埕燃起新劇運動烽火的C君是以張維賢為原型。以上參見石婉舜，《一九四三年台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頁45。

⁵⁴井手勇認為〈抗議〉是《台灣文學》陣營對時事態度的象徵性作品，傳達中山侑不滿於當時台灣的文化政策，意圖「將皇民化劇作為真正的戲劇而復活」的理念；石婉舜認為〈抗議〉傳達一群大稻埕本島人菁英對皇民化劇實情的苦悶、焦慮與使命感；鳳氣至純平認為〈抗議〉展現

作為「內地人」長期在「殖民地台灣」從事文化運動時的「不安」，與作為「灣生」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思考。小說〈抗議〉呈現男主人公公助面對「殖民地台灣」的「異民族」時「不安」的情感。對於公助而言，他作為「內地人」，面對多數的「本島人」是帶有強烈的「不安」。然而，他在從事文化運動的過程，透過與本島人知識份子的交流，逐漸找到消除「不安」的可能。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近代性」的追求，及對於「殖民地台灣」「在地性」的重視，都與公助的想法貼近。而公助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共同想像，亦使公助找到繼續指導建設「台灣」文化的動力。

中山侑作為劇作家，在 1942 年書寫的劇本〈客廳〉同樣是以自己和《台灣文學》同仁為原型。⁵⁵劇本〈客廳〉表達中山侑對於當時「皇民化運動」、「內台融合」的回應。先行研究大多聚焦於〈客廳〉對於「皇民化」的批判。⁵⁶然而，本論文認為在探討中山侑對於「皇民化」的回應時，不應只以二元對立的可能

中山侑對台灣人心情的關心。以上分別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年），頁 132-133；石婉舜，《一九四三年台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頁 44；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96。

⁵⁵吳宗佑在碩士論文指出〈客廳〉的角色設定的原型：大稻埕的執業律師、曾出資辦文學雜誌的林清月是以陳逸松為原型，而有正職、並且在業餘時間投入青年劇運動的田上熊生是以中山侑本人為原型。以上參見吳宗佑，《「民眾」的戲劇實踐：以日治時期日台知識人的劇本創作為中心（1923-194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頁 75。

⁵⁶井手勇認為〈客廳〉是引導台灣人皇民化的劇本，指出「中山侑的抗議並不是對皇民化本身，而是針對現行的皇民化運動忽視文化的批判」；鳳氣至純平聚焦於〈客廳〉本島人清月最終「日本國民化」的失敗過程，認為中山侑藉此指出「台人的日本國民化含有矛盾且最後不免失敗」；吳宗佑認為中山侑在〈客廳〉裡除了延續小說〈抗議〉的問題意識：何謂「國民」生活之外，更透過劇本中近乎日本化的本島人女主角月霞對「國民」生活強烈的不安，來指出台灣人之所以無法成為「國民」的關鍵在殖民地台灣永遠懸宕的種族歧視問題。以上分別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年），頁 133-134；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09；吳宗佑，《「民眾」的戲劇實踐：以日治時期日台知識人的劇本創作為中心（1923-194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頁 76、78。

／不可能來思考。對於〈客廳〉田上熊生、月霞與磯江京子的關係，也不應只以「民族」討論，而應進一步思考彼此情感上的糾葛。雖然〈客廳〉直到最後，田上熊生皆並未選擇月霞與京子的其中一人，某種程度反映其對於「民族」問題的思考，但月霞最終卻帶京子返回「殖民地台灣」偏遠的鄉下，似乎代表中山侑對於「灣生」身分認同的解答。正因為月霞受過完整的日本近代教育，還有京子對於「本島人」的理解，所以兩人在「文化認同」上得以產生交集。月霞不必再以成為「近似母國的內地人」為目標，京子亦不必再因「內地人」和「本島人」間由於「民族」衍生的問題而放棄自己的情感。並且，京子作為「內地人」，在月霞的陪同下或許能夠進一步察覺到過去在「殖民地台灣」難以看清的「在地性」。這樣的安排或許呈現中山侑對於未來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

（三）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⁵⁷（1921-2014）

有鑒於紀錄片《灣生回家》⁵⁸過於強調戰後「灣生」對於台灣的「鄉愁」，忽略了「灣生」作為「殖民者」的歷史背景，最後造成「鄉愁」去脈絡的解讀。若欲論及戰後「灣生」對於「台灣」的情感，不應只聚焦於其對於台灣「鄉土」的認同而已，而是應考慮其戰前的「殖民經驗」與戰後時空背景的變化。故本論文以足跡橫跨戰前至戰後的龜田惠美子作為與《灣生回家》對話的對象，試圖呈現「灣生書寫」裡「鄉愁」、「故鄉」涵義的轉變。

龜田惠美子由於 1944 年與丈夫黑羽義治結婚，改名「黑羽惠美子」。直到黑羽夏彥提供詳盡的資料前，龜田惠美子的生平一直鮮為人知。⁵⁹故先行研究主

⁵⁷雖然「龜田惠美子」於 1944 年與丈夫黑羽義治結婚後改名為「黑羽惠美子」，但為求整體行文一致性，本文不論戰前或戰後皆仍以舊名「龜田惠美子」稱呼，特此說明。

⁵⁸黃銘正導演，陳宣儒監製，紀錄片《灣生回家》，2015 年 10 月 16 日於台灣上映。

⁵⁹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的生平，其孫黑羽夏彥提供詳盡資料。黑羽夏彥，〈「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一）～（三）〉，（來源：<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377.html>），

要聚焦於龜田惠美子戰前的小說〈ふるさと寒く〉(〈故鄉寒冷〉)⁶⁰。戰後被遣返回國的龜田惠美子於 1983 年再度來台，並且出版散文集《旅の朝》(《旅之朝》)⁶¹，收錄許多關於殖民地台灣的記憶與書寫。由於政治情勢的變化，原本的「日台」關係，轉變為「日華」關係。相較於戰前的小說〈故鄉寒冷〉，戰後《旅之朝》流露的「鄉愁」已淡化許多。並且，戰後的她作為「日本」國民重新回到不同國家的「台灣」時，比起「鄉愁」，感受更多的是「疏離感」。若觀察她返台的足跡，可以發現有明顯的「尋根」傾向。她在「尋根」的過程，「疏離感」與「鄉愁」反覆在書寫裡交織出現。而除了「鄉愁」之外，《旅之朝》亦可發現龜田惠美子對於「殖民台灣史」的重新回顧呈現不同於「母國日本人」的「灣生」視點。她在回憶過去的台灣經驗時，不只是以理性的眼光審視過去的「殖民者」經驗，亦兼顧對於「本島人」被殖民經驗的理解與尊重。她的台灣認同，來自從小出生並成長的鄉土與自己的身體經驗。台灣作為她的「根」，在描寫台灣的同時，亦是形塑自己的「灣生認同」。

2017 年 8 月 16 日)。而作家一青妙曾於台南採訪黑羽惠美子之孫黑羽夏彥先生。黑羽夏彥近年來致力於日治時期台灣作曲家與聲樂家江文也的相關研究，並訴說自己對台灣歷史關心的緣由來自祖父母。他從祖母(黑羽惠美子)口中聽到許多關於台灣的事情，並透露祖母已於 2014 年逝世的消息。以上參見一青妙著，張雅婷譯，〈移居台南的個性派日本人〉，《我的台南：一青妙的府城紀行》(台北市：聯經，2015 年)，113 頁。筆者將上述資料作為表格，附於本論文末的〈附錄〉方便閱讀。

⁶⁰龜田惠美子，葉石濤譯，〈故鄉寒冷〉，《台灣文學集 1—日文作品選集》(高雄市：春暉，1996 年)；林慧君，〈第六章—「皇民化」下的身分認同〉，《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2015 年)；邱雅芳，〈殖民地新故鄉？真杉靜枝從〈南方之墓〉到〈南方的語言〉的台灣意象〉，《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台北市：聯經，2017 年)。

⁶¹黑羽惠美子，《旅の朝》(東京：日本隨筆家協會，1986 年)。

第四節 章節架構

第一章：緒論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範圍與文獻回顧
- 四、章節架構

第二章：「宗主國」的「局外人」：真杉靜枝小說裡的「灣生」困境

- 一、「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雛雞〉
- 二、「南進政策」下的重責與艱困：〈烏秋〉
- 三、「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隨筆集《無謂的振翅》

第三章：「未竟的志業」：中山侑的理想與阻礙

- 一、作為「外來者」的「不安」：中山侑的早年活動
- 二、建設「台灣」文化的困境與動力：小說〈抗議〉
- 三、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劇本〈客廳〉

第四章：尋根之旅：戰前至戰後龜田惠美子的台灣「鄉愁」

- 一、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1921-2014）生平
- 二、介於「故鄉」之間：〈故鄉寒冷〉
- 三、「台灣」記憶的重構：《旅之朝》的台灣書寫

第五章：結論

第二章

「宗主國」的「局外人」：真杉靜枝小說裡的「灣生」困境

前言

真杉靜枝（1900-1955）長期定居並活躍於「宗主國」文壇，同時亦是出身「殖民地台灣」的作家。對於自己成長的地方「殖民地台灣」，真杉靜枝是帶有複雜的情感。關於真杉靜枝小說裡「殖民地台灣」意象的轉變，先行研究大致以真杉靜枝於 1921 年離開台灣前往大阪，至 1939 年與中村地平一同返台為界劃分前後。在真杉靜枝前期的作品，「殖民地台灣」被視為如「女性之墓」、「暗黑世界」般的存在。⁶²原因除了殖民地台灣的日人女性受到男性嚴厲的管控⁶³外，更與近代日本移民階層呈現的「敗者」群像⁶⁴有關。而這些都不離真杉靜枝自身在「殖民地台灣」成長經驗，包括婚姻生活的破碎⁶⁵、來自母親在其青春成長期的身體管控以及父母的婚姻不被內地的家人接受必須來到台灣⁶⁶的緣由。時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真杉靜枝的殖民地成長背景成為日本陸軍宣傳「南進政策」的重要人選。⁶⁷相較於前期，此時真杉靜枝小說裡的「殖民地台灣」除了充滿「南國之美」⁶⁸外，也不再是一心想逃離的地方，而是精神安定之

⁶²李文茹，《帝国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 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 年），頁 22。

⁶³同前註。

⁶⁴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 年），頁 44-45。

⁶⁵邱雅芳，〈殖民地新故鄉－以真杉靜枝〈南方之墓〉、〈南方的語言〉的臺灣意象為中心〉，《文史台灣學報》2 期（2010.12），頁 76。

⁶⁶同註 64，頁 31。

⁶⁷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 期（2008.06），頁 69。

⁶⁸同前註，頁 70。

處⁶⁹。這種轉變與此時真杉靜枝的經歷有關，包括戰爭體制下對於時勢動員的強烈意識⁷⁰，及 1939 年返台的旅程裡達成與母親的和解⁷¹。然而，即使是在戰爭時期「南進政策」推行時，真杉靜枝仍舊強調自己的「宗主國」出身：

我是在福井縣的鄉下出生。可是福井的事情，幾乎甚麼都不知道。從小學四年級左右就前往大阪，在母親的娘家裡長大。雙親從我非常小的時候，就到台灣。然後我也從十四歲左右，開始在台灣生活。⁷²

不過，根據十津川光子的調查，真杉靜枝約在三歲隨父母渡台後，僅於十一歲時因父親罹患風土病而暫時返回大阪祖父母家，並在福井縣的小學校度過兩學期。⁷³真杉靜枝刻意隱瞞自己「殖民地台灣」成長的經歷，反映其對於自己殖民地出身的「不安」，並投射於此時期真杉靜枝作品的敘述視點。

關於真杉靜枝的寫作風格，先行研究皆指出真杉靜枝擅用第一人稱，並使用與自身經驗高度相關的「私小說」手法寫作。⁷⁴值得注意的是，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並非皆是直接描寫「殖民地台灣」，許多是以描寫居住於「殖民地台灣」的家人為主。對此，吳佩珍指出真杉靜枝將台灣視為「第二」故鄉，正是與其

⁶⁹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 年），頁 42。

⁷⁰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 期（2008.06），頁 78。

⁷¹同註 69，頁 31。

⁷²本章採用復刻版：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臺灣の土地〉，《女性のみた近代 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年），頁 137-138。原文：「私は、福井縣の田舎で生れた。けれども福井のことは、ほとんど何も知らない。小學の四年位から大阪へ出て、母方の里になっている家に育った。両親は、私がずっと幼ない頃から、臺灣にいつている。それで私も十四の頃から、その臺灣にいつた。」

⁷³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 年），頁 37-38，42。

⁷⁴同註 69，頁 23；同註 70，頁 70。

雙親齊帶相連的重要記號。⁷⁵而除了雙親外，妹妹勝代及勝代的兒子（真杉靜枝的外甥）亦在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經常出現。雖然真杉靜枝早在 1921 年就已離開台灣並長期定居宗主國，但與勝代的聯繫並未因此中斷，期間曾邀請勝代前來東京。⁷⁶勝代的丈夫是小學校長，1930 年突然因心臟病去世。此時年僅 25 歲的勝代已懷有身孕，並撫養兩位年幼的男孩，成為「未亡人」。⁷⁷這個「未亡人」形象經常出現在戰爭時期真杉靜枝的台灣相關作品。⁷⁸然而，勝代除了「未亡人」形象外，同時也是「殖民地台灣」成長的「準灣生」。勝代的兒子則是「殖民地台灣」出生並成長的「灣生」。故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裡，「準灣生／灣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她在描寫家人與殖民地台灣的作品裡，展現與「母國日本人」相異的視點。不過，這亦不完全是「灣生」的視點，而是同時具有部分「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灣生」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除了與真杉靜枝成長於「殖民地台灣」及長期定居於「宗主國」的經驗有關外，也與其強烈意識到廣大的「母國日本人」讀者群的「視線」有關。

本章欲聚焦於真杉靜枝在作品含有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從這個視點來閱讀真杉靜枝的兩篇小說〈ひなどり〉（〈雛雞〉）（1938 年）和〈烏秋〉（1941 年），及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1940 年）的部分書寫，可以觀察到兩個不同的面相。一個是小說裡，「灣生」「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另一個是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與矛盾。此外，這個「中介者」（in-between）視點的意涵隨著真杉靜枝返台前後的經歷而稍有差異，這亦是本章將進一步探討的部分。

⁷⁵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 年），頁 34。

⁷⁶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 年），頁 83。

⁷⁷同前註，頁 85。

⁷⁸李文茹，〈殖民地・戦争・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 期（2008.06），頁 73。

第一節 「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小說〈雛雞〉⁷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中央為了完成戰爭的動員，於同年8月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作家逐漸被納入戰爭體制。⁸⁰原有的左翼雜誌《女人藝術》改組成國策色彩濃厚的《輝ク》（《輝耀》），真杉靜枝是其中一員。⁸¹因應時勢變化，此時真杉靜枝開始反覆強調自己與「殖民地台灣」的關係。⁸²而真杉靜枝居住於台灣的家人亦常出現於此時的作品。

1939年5月真杉靜枝的小說〈ひなどり〉（〈雛雞〉）收錄於同名小說集《ひなどり》。吳佩珍指出此篇小說是改編自真杉靜枝的隨筆〈妹の子供〉（妹妹的孩子），並表現真杉靜枝對於「人種」與「語言認同」的曖昧性（ambiguity）與混雜性（hybridity）。⁸³小說的內容是透過女主人公縞代之眼，觀察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外甥到「宗主國」參與修學旅行的過程。關於外甥的出身，小說如此描述：「外甥在台灣出生後不久就喪父。身為母親的縞代妹妹，在那之後一直待在台灣那塊土地，一邊以公學校老師的身分工作，一邊辛勤地將其撫養長大」（〈ひなどり〉，頁7）⁸⁴，是一名「灣生」。對於同樣出身「殖民地台灣」的女主人公縞代而言，「灣生」理應是熟悉的存在。然而，或許是因為縞代長期定居「宗主國」的關係，此時對於眼前的這群「灣生」，已無法分辨其中的區別。

⁷⁹本章採用藏於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的版本。真杉靜枝，〈ひなどり〉，《ひなどり》（東京市：竹村書房，1939年），頁7-31。

⁸⁰柳書琴，〈導言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4。

⁸¹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06），頁67-68。

⁸²同前註，頁70。

⁸³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186-187。

⁸⁴原文：「臺灣で生れると直ぐ、親を喪している甥で、母親である縞代の妹が、その後もずっとその土地に踏みとまって、公学校の先生を勤めながら、甲斐甲斐しく育ててきたのである」。

起初，縞代認為由於「血緣的關係，應該可以馬上以直覺辨認，但沒想到不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外，眼睛大致掃過這當中，不論哪個孩子看來都像是陌生人般，感到不安」(〈ひなどり〉，頁8)⁸⁵。儘管如此，縞代仍可體會到這些「灣生」初入「宗主國」時的「不安」。縞代與「灣生」在情感上的共鳴，使其「在孩子清澈明亮的眼」，「立刻感覺到自己扭曲的面容」(〈ひなどり〉，頁10)⁸⁶。這種共鳴不僅是身處「宗主國」的「不安」而已，亦包括「灣生」對於「宗主國」的憧憬。⁸⁷如此的描寫顯現縞代具有「灣生」視點。

儘管縞代與「灣生」在情感上有所共鳴，但久居「宗主國」的經驗亦使其無法忽視在「灣生」身上看到相異於「母國日本人」的「特殊性」。小說裡對於這個「特殊性」有具體的描寫。當「灣生」搭乘電車時，縞代首先關注的是「大家的胸前，都縫著他們寫著南方殖民地的小學校名字的白布」(〈ひなどり〉，頁10-11)⁸⁸。同時，縞代注意到其他乘客們「察覺到那塊罕見的土地的學校名字後，接著，被孩子們不同於內地孩子的暗黃色皮膚所吸引」(〈ひなどり〉，頁11)⁸⁹。顯眼的「南方殖民地」與「暗黃色皮膚」，成為刻印在「灣生」身上的獨特印記。伴隨這樣的獨特印記而來的是「宗主國」(象徵都市)與「殖民地台灣」(象徵鄉下)的「位階」問題。小說裡描寫這群「灣生」和隨行老師前往旅館時，旅館男子以傲慢的態度對待老師。而這位老師「身材短小，不習慣都市，帶著提心吊膽的表情，因此在縞代看來，旅館的男子顯得更加傲

⁸⁵原文：「血のつながりは、直ぐにカンで判るはずだと思えたが、案外、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くひととほり眼が走るうちに、どの子の顔も他人であるやうな不安を覺えた」。

⁸⁶原文：「子供の眼の澄んでいるのがまぶしく」、「自分の顔が直ぐにゆがんでしまふのを感じた」。

⁸⁷真杉靜枝，〈ひなどり〉，《ひなどり》(東京市：竹村書房，1939年)，頁12。

⁸⁸原文：「その胸に皆、いちやうに白い布を縫ひつけていて、それに南方植民地の彼等の小學校の名が書きつけてある」。

⁸⁹原文：「その珍しい土地の學校の名に氣付くと、續けて、子供たちの皮膚の色が、内地の子供とちがって、黒つぽく黄色いのに眼を惹かされている」。

慢無禮」(〈ひなどり〉, 頁9)⁹⁰。

「灣生」亦有察覺這樣的「歧視」眼光，對此深感「不安」。從上野車站走至旅館，經過一個熱鬧的地方時，他們「以像是渡過危險的獨木橋時的表情，不安地跑過去」(〈ひなどり〉, 頁15)⁹¹。他們不僅「不安」於「母國日本人」的視線，對於眼前的事物「孩子們已經被教導成只對老師出聲指示的方向感到有吸引力」(〈ひなどり〉, 頁13)⁹²。縞代認為「這次的旅行對於孩子們而言，完全是教室的移動。停下腳步的地方就是教室，心中也除了教科書之外甚麼都沒有」(〈ひなどり〉, 頁14)⁹³。對於長期身處「殖民地台灣」的「灣生」而言，「宗主國」的事物是透過「教科書」來認知的。他們對於「宗主國」的想像與「教科書」的內容一致，對於「宗主國」的疏離感亦是此刻「灣生」感到「不安」的原因。

晚餐後，縞代與外甥兩人逛著銀座。起初，相對於縞代的熱情，外甥的態度是冷淡的。⁹⁴只有縞代買給外甥「放大鏡」時，外甥才初次微笑地感謝。縞代在買放大鏡前，並不知道外甥喜歡什麼，只有放大鏡才是孩子真心喜歡的。而買放大鏡後的縞代主動買給自己的「雜誌」，更成為兩人目光的交集點。小說裡提到縞代購買「雜誌」的原因：

正好，在東京迎接孩子旅行隊伍時，縞代正處於緊迫的生活狀態，雖然當時帶著挫折的心情，但不可思議的，現在正慢慢渡過那個瓶頸。牽著

⁹⁰原文：「先生が小柄で、都會馴れない、おどおどした表情をしているので、なほさら、縞代の眼に旅館の男が横柄にうったのである」。

⁹¹原文：「かういふ場所を、危い一本橋でも渡る時みたいな緊張した顔付きで、たよりなく馳けぬけるのであった」。

⁹²原文：「子供達は、先生が掛け聲をして、指し示した方面にだけしか魅力をもたないやうに仕込まれていた」。

⁹³原文：「こんどの旅行は、子供たちにとって、立派な教室の移動であった。足をとめたところが教室で、心の中にも教科書だけしかもってはいない」。

⁹⁴真杉靜枝，〈ひなどり〉，《ひなどり》(東京市：竹村書房，1939年)，頁18。

孩子，看著自己手上捧著雛雞的耀眼樣子，便感覺到哪似乎都能堅持下去。⁹⁵

這隻「雛雞」不僅寄託縞代與外甥的親情，同時亦是縞代與「殖民地台灣」的連結。對於縞代而言，「雛雞」給予原本處於和戀人春吉吵架氣氛的她繼續生活下去的動力。儘管「雛雞」是縞代認同的所在，卻亦是「不安」的來源。縞代不確定這隻象徵自己與「殖民地台灣」連結的「雛雞」能否被春吉接受。不過，當春吉表示自己喜歡這隻「雛雞」，「他的臉上，不愉快難得地消解了」（〈ひなどり〉，頁 25）⁹⁶時，縞代心中的「不安」才終於卸下。這部分的描寫反映真杉靜枝對於自己「殖民地台灣」出身的矛盾情感。而在這趟旅行接近尾聲時，縞代注意到外甥的日記「不論翻到哪頁，都無法找到伯母的事」（〈ひなどり〉，頁 27）⁹⁷。這與外甥面對其他來自東京的人、事、物時的反應完全不同。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當外甥等「灣生」孩子們在東京實際面對到「教科書」未寫的事物時，僅能仰賴老師居中講解。因為這些並非熟悉的事物，所以「搭上遊覽巴士，參加一日市區參觀學習的小孩們，正將那個記憶，像是在教室寫下答案般的嚴肅態度般，記在日記上」（〈ひなどり〉，頁 26）⁹⁸。對比東京的人、事、物，外甥在與伯母縞代相處的過程，意識到伯母對於自己的關愛。這份關愛對於外甥是深刻的，因此不需要寫入日記。外甥透過與伯母間的親情，不僅建立起自己在「宗主國」的連結，同時亦找到消除「不安」的可能。

⁹⁵同前註，頁 20。

原文：「恰度、子供の旅行隊を東京に迎へたのが、縞代のそんな切迫した生活の最中で、壁に頭を打ちつけたやうな気持ちの折柄であつたのだが、不思議と、今はその行き詰りにゆとりが流れ込んできている。子供をつれて、ヒヨコを腕に抱いている自分の姿の輝しさが、どこまでも續きさうな気がしている」。

⁹⁶原文：「その顔から、珍しく不機嫌さをゆるめ」。

⁹⁷原文：「どの頁をくつても、伯母さんのことは一行も見當らなかつた」。

⁹⁸原文：「遊覽バスで、一日市内を見學してきた子供達は、その記憶をいま、教室で答案でもかかく時のやうな嚴肅さで日記に記している」。

第二節 「南進政策」下的重責與艱困：小說〈烏秋〉⁹⁹

1941年1月真杉靜枝再度返台。這次與1939年與中村地平一同訪台的情況不同，是以陸軍軍部的「南之派遣軍慰問團」成員的身分前往廣東，並於往返的過程短暫停留台灣。¹⁰⁰離台將近18年的真杉靜枝對於這兩次相隔不久的返台經驗難以忘懷。她在返回內地後，將兩次的返台經驗先後分別收於1940年的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及1941年的小說集《ことづけ》（《囑咐》）、《南方紀行》。¹⁰¹在這些作品，真杉靜枝的描寫對象已由台灣的「內地人共同體」及「內地人女性」轉向台灣的「本島人」及「高砂族」。¹⁰²除了前面〈雛雞〉裡的外甥外，妹妹勝代同樣是真杉靜枝台灣書寫裡重要的對象。勝代在公學校擔任教師，背負「皇民化運動」的使命。對於妹妹的處境，真杉靜枝在小說〈烏秋〉裡有所呈現。小說〈烏秋〉的一開始，女主人公八重來到台灣準備在兩天後要去拜訪居住於南部的父母親。八重在返鄉途中搭乘南下的火車。火車載滿「許多臉看起來像是當天才從內地搭船抵達不久，洋溢著活力神情」（〈烏秋〉，頁11）¹⁰³的人。對比這些人，吳佩珍指出八重認為自己是異於這些由於戰爭動員與南進政策才渡台的「母國日本人」。¹⁰⁴但同時，八重又與「雙親和年輕的未亡人妹妹，與妹妹的孩子們住著的那個家」（〈烏秋〉，頁16）¹⁰⁵不

⁹⁹本章採用復刻版：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烏秋〉，《女性のみた近代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頁3-40。

¹⁰⁰楊智景，〈解題〉，《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年），頁248-249。

¹⁰¹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06），頁68-69。

¹⁰²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108。

¹⁰³原文：「その日内地から着いたばかりの船から乗りこんだ、新鮮な活氣のみなぎりあふれた顔が沢山みられた」。

¹⁰⁴同註102，頁91。

¹⁰⁵原文：「両親と若い未亡人の妹と、その妹の子供達との住んでいるその家に」。

同。八重指出自己「僅僅偶爾從內地來訪後加入而已，和雙親一同生活這件事，從小的時候就沒有」（〈烏秋〉，頁 16）¹⁰⁶，否認自己的「殖民地出身」。儘管八重看似具有〈雛雞〉裡緜代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卻稍有差異。〈雛雞〉裡緜代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是介於「灣生」（外甥）與「母國日本人」之間，而〈烏秋〉裡女主人公八重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是介於「準灣生」（妹妹照枝）與「母國日本人」之間。在小說〈烏秋〉裡，八重與照枝是鮮明的對比。八重「由於在都市主修繪畫，而且未婚，所以有著忘卻其齡般的年輕氣息」，照枝則「心情上是撫養著這樣的孩子的母親，因此顯得格外蒼老」（〈烏秋〉，頁 37）¹⁰⁷。擁有長期定居「宗主國」經驗的八重深刻地認知到：「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並非實施「皇民化運動」就可消除的。故在此視點下，小說裡「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實行皆充滿弔詭的畫面。

八重對於「皇民化運動」廣立的神社與參拜有深入的觀察。返鄉後的早晨，八重來到家裡附近的神社正看到大約二十名本島人壯丁穿著「青年團的團服」與「地下足袋」井然有序地在觀看吹笙的樣子，目的是為了培養本島人成為神樂的樂手。可是在這種嚴肅的場合，作為神官的父親以「咬字非常清楚的語調」對本島人解釋最基本的道理。他不只提醒本島人吹奏樂器時要帶著「清淨美好的心」，還有接受樂器講習的期間「盡量不要吃蒜頭」。¹⁰⁸另外，身處神社社務所的母親正思索這些台灣壯丁的團服與足袋的大小為何，並對八重說出苦惱的原因：「不管怎樣，都是因為〔筆者註：這些本島人壯丁〕是沒有穿過內地和服之類的人啊」（〈烏秋〉，頁 16）¹⁰⁹。這部分凸顯此時大量興建的神社在本

¹⁰⁶原文：「ほんの時たま内地から訪ねて来て加はるだけで、両親と一緒に暮したことは、子供の頃から無いのであった」。

¹⁰⁷原文：「都會で繪の修業をしていて、結婚をしないので、年齢を忘れて若い氣でいるのであったが、妹は、このやうな子供を持つ母の心で必要以上にも老けている」。

¹⁰⁸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烏秋〉，《女性のみた近代 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年），頁 18。

¹⁰⁹原文：「何しろ、でも内地の着物なんて、着たことない人ばかりですからね」。

島人的社會裡存在的違和感。同時，對於當時政府鼓勵的「改姓名運動」，八重亦察覺到其中的詭譎之處。這群本島人壯丁裡，有位發音完全正確的米原君。午後，當八重正前往郡公所在的街上時，看見官員正在神殿前對著早上那些從青年團服變成全白裝扮的本島壯丁致詞。此時父親說道：「那麼，點名吧。陳君劉君金君黃君李君……不對李君呢，已經改名了吧，啊是米原君吧……」（〈烏秋〉，頁 20）¹¹⁰。米原君原姓李，然而改了姓名後，父親點名時卻仍下意識地把「米原」叫成「李」。儘管本島人的名字改了，卻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內地人對於本島人的既定印象。而小說〈烏秋〉對於「國語對話」的課程亦有描寫。當八重來到妹妹照枝任教的公學校時，在一年級的班級教室看到豐田老師正在糾正本島人小孩無法正確地發出日文裡「て」、「れ」，並容易將兩者混淆的情況。八重對此說道：「不管在任何國語講習所皆會發生類似那樣的事情，本島人孩子們的發音不容易矯正」（〈烏秋〉，頁 24-25）¹¹¹。

回到本篇小說「烏秋」象徵的涵義。「烏秋」總共在小說出現三次。「烏秋」的初次出現是在八重返鄉的火車上。八重聽到「同樣似乎是從內地的船剛上岸不久的一個紳士」說道：「烏秋，是凶猛的鳥兒。日本當中只有台灣才有，以那微小的身軀，在空中飛翔的同時，居然像老鷹挑戰」、「向老鷹挑戰，直到那老鷹放掉口中的獵物為止，因為對方不輕易放棄口中的獵物」（〈烏秋〉，頁 13）¹¹²。對於火車上「宗主國」來的乘客而言，「烏秋」象徵為在日本帝國與宣戰國間周旋的「台灣」所處的中介及曖昧的定位。¹¹³烏秋的第二次出現是在八重返鄉後，母親對八重說道：「情況怎麼樣？—當地呢，應該很艱難吧？」（〈烏

¹¹⁰原文：「では、點呼しますよ。陳さん劉さん金さん黄さん李さん……いや李さんは、改姓したのでしたね、ああ米原さんでしたね……」。

¹¹¹原文：「他のどの國語講習所でもさうであるやうに、なかなか、その小さな達の舌に乗らない」。

¹¹²譯文轉引自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 91。

¹¹³吳佩珍認為此處的「烏秋」為台灣象徵的意象。「台灣」同時成為在國力懸殊的情況下，日本對歐美列強以及中國所發動的戰爭中日本的「代言媒介」。參照同前註，頁 92。

秋》，頁 15）¹¹⁴。母親口中的「當地」是指八重待的「東京」。儘管小說裡八重不承認自己的「殖民地出身」，但不可否認的是，八重確實有火車上那些「母國日本人」看不見的視野。而具有「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的八重在作為純正日本象徵的「東京」生活理所當然是「艱難的」。當八重回答母親：「艱難是艱難，但只要堅持下去就好了。不管是誰……」(《烏秋》，頁 16)¹¹⁵時，烏秋從旁邊快速飛過。此處「烏秋」寄寓「殖民地出身」的八重在「宗主國」生活的堅韌之心。而「烏秋」的最後出現是透過照枝說出：「冀望慈母心，威猛似烏秋」(《烏秋》，頁 37)¹¹⁶。對於「皇民化」在「殖民地台灣」的實施，八重與實際身處「殖民地台灣」的照枝產生視點的差異。對於此時「皇民化運動」盛行的「殖民地台灣」，八重認為：「沒有變化呢，春夏秋冬，此處的生活……」(《烏秋》，頁 39)¹¹⁷。然而，當八重說完後，照枝對八重說出以下這番話：

因為這塊土地並沒有嚴冬這樣的季節，也沒有明顯的季節變化。但看著烏秋，便從鳥兒的身上清楚看見季節的變化呢。一到秋天，便是烏秋最凶猛的時候。並列在電線桿上，開始喧鬧地鳴叫，對此刻的烏秋而言鳶鳥根本不算什麼，大姐，就算是老鷹，烏秋也會衝向前去打贏牠。……只要一到秋天，看見烏秋的身影，彷彿是深深地嵌入自己的心坎般告訴自己：還是得好好振作，向前努力才行！¹¹⁸

此處的「烏秋」象徵「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照枝原先認為「這塊土地並沒有嚴冬這樣的季節，也沒有明顯的季節變化」。然而，在現今的「南進政策」

¹¹⁴原文：「どうだった？—現地は、大へんだったでせうね。」

¹¹⁵原文：「大變は大變でも、しっかりしさへすればいいんです。誰でもが……。」

¹¹⁶原文：「烏秋に似て猛けかれと母ごころ」。譯文轉引自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 92。

¹¹⁷原文：「變化がないわね、春夏秋冬、此處の生活は……。」

¹¹⁸譯文轉引自同前註，頁 92。

下，照枝卻認為「從鳥兒的身上清楚看見季節的變化」，如同「皇民化」的軌跡可從「本島人／本島文化」的轉化上清楚地看見。但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宗主國」的八重而言，她知道在「母國日本人」眼中，「殖民地台灣」具有的「在地性」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消滅的。這與八重一開始在返鄉的火車上聽到的聲音呼應。當時，八重除了聽到來自「母國日本人」的聲音外，也傳來「其他」乘客的聲音：「從地圖上一目了然的是，日本是如此小的國家，而對方的支那大陸卻是這樣的龐然大物」（〈烏秋〉，頁 14）¹¹⁹。因此，八重認為實際在「殖民地台灣」推行「皇民化」政策的照枝肩負的任務是困難的。而事實上，讀者在〈烏秋〉透過八重之眼看到的，不管會話課或神社的參拜，本島人皆難以體會到神社、日語蘊含的「日本精神」。不過，對於在公學校面對「本島人」的孩子，教育「日本的事物」，作為「日本文化」與「本島文化」間「中介者」的照枝而言，她與八重的想法不同。照枝不像八重認為「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是前進的阻力，反而認為「南進政策」賦予「皇民化」的責任使自己找到自我定位。而與妹妹照枝具有深厚感情的八重看到「南進政策」下照枝的轉變時，在小說的結尾說道：「覺得似乎聽到了妹妹在殖民地的未亡人生活的春夏秋冬」（〈烏秋〉，頁 40）¹²⁰。身處殖民地的照枝在面對「殖民地台灣」「在地性」時展現的自信，亦成為長期在「宗主國」生活的八重在面對自己「殖民地出身」時一股安定的力量。

¹¹⁹譯文轉引自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 91。

¹²⁰譯文轉引自同前註，頁 93。

第三節 「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隨筆集《無謂的振翅》¹²¹

除了透過前述的小說〈雛雞〉與〈烏秋〉理解女主人公的返台前後的視點差異之外，就真杉靜枝個人而言，又是如何展現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思考？真杉靜枝在返回內地後回顧造訪台灣的經驗時，對於時下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情況發表以下的看法：

之前曾造訪台灣，這個小小殖民地的政治情況，現在其實非常複雜。表面上看來物資豐饒，當地土生的台灣人也有許多有錢人。由於性格溫吞，追求物資的態度悠閒，台灣人看來是享受著生活。官僚的統治也如同梳子梳理過般，看來周到完善，不像有什麼嚴重事態。但只要深居內部，仔細一看，才發現存在著令人擔憂的民族問題仍有待解決。¹²²

這段話透露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台灣」「異民族」問題的「不安」。這個「不安」不僅源自真杉靜枝在殖民地台灣的成長經驗¹²³，還有長期居住於台灣的家人。真杉靜枝的父親真杉千里原本在台中附近的「胡盧屯」擔任中學教師，後來受真杉靜枝與武者小路實篤戀情的風波影響，轉任神社的神官。1938年3月曾文神社落成後便在此擔任神官。¹²⁴「皇民化運動」時期，廣立「神社」在「宗教、風俗的改革」是作為一個重要項目執行。周婉筠指出，台灣一半以上的神社都是在「皇民化運動」興建的。殖民當局除了在日常生活強制台灣人在

¹²¹本章採用藏於國立台灣圖書館的版本。真杉靜枝，《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協力出版社，1940年）。

¹²²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臺灣の土地〉，《女性のみた近代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頁138-139；譯文轉引自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頁95。

¹²³同前註，頁95。

¹²⁴同前註，頁2。

家裡祭祀神宮大麻外，公家機關也動員台灣人參拜神社。然而，雖然很多台灣人家家庭領到大麻，但真正祭拜的人可能非常少。¹²⁵真杉靜枝作為「中介者」(in-的思考呈現在對於當時「殖民地台灣」大量興建的神社的看法。1940年真杉靜枝返回內地後出版的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的〈南方の雨〉(〈南方之雨〉)有以下這段記述：

由於因事變後應殖民地統治而使用的皇民化運動標語，如今神社正好在台灣統治上被置於重要的位置。起初，附近的本島人和內地人，官吏和商人在經過神社的鳥居前時，皆被鼓勵要脫帽致意。正因如此，暫居在此的我從書房的窗邊遠遠望著那些通過鳥居前面且出入神社的人們，即使看似自由主義者的人，也必定行最鄭重的敬禮。不過，暫居在此的我卻不知何故對此感到為難。即使擔心被人看見，而感到有些難為情地行禮，也僅是藏身在巨大的鳥居柱子之後，而低下頭來。¹²⁶

透過這段敘述，可以發現真杉靜枝在面對「殖民地台灣」神社的態度上，與其他身處「殖民地台灣」的人們不同。她之所以對「殖民地台灣」神社敬禮一事感到為難，或許可以從另一篇同樣收錄於《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的〈移りゆく臺灣〉(〈變化的臺灣〉)得知：

¹²⁵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台北市：聯經，2016年)，頁226。

¹²⁶真杉靜枝，《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協力出版社，1940年)，頁203-204。原文：「皇民化運動のスローガンを事變に對處する植民地統治に使っているので、今は恰度神社が臺灣統治の上に重要な位置におかれている。先づ附近の本島人や内地人、役人や町人も、神社の鳥居の前を通過する時は、必ず脱帽することが奨励されている。そんなわけで、滞在中私にあてがはれた勉強部屋の窓からみていると、ずっと向ふの、鳥居の前を通つたり、その下を出入りしたりする人は、どんなに自由主義者らしい風貌の人も、必ず最敬禮をして通る。けれども、私には、滞在中それがなぜか為しにくくて困つた。人が見ていないか、と恥しくて、禮をするにしても、太い鳥居の柱のかげに身をかくすやうにして頭を下げた」。

搭乘火車、電車，或是巴士奔馳於美麗的風景時，在遙遠的遠方，望見白色的鳥居。啊……，此處也有神社啊，我如此想著。而正當我那樣想時，車內正專心準備考試的中學生、沉浸於小說和報紙內容的官吏及上班族等，一律脫帽並默默行禮。我不覺地對這些人的舉動感到訝異。面對這個如同東京那般，車掌沒有必要透過廣播說道「各位，現在列車正通過神宮前」的習慣，我感覺到眼前有著看不見的巨大力量。¹²⁷〔底線為筆者強調〕

顯然，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台灣」的人們能否理解「神社」具備的「精神內涵」一事感到質疑。她認為「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是難以透過「皇民化」而改變的。即使見到此時「殖民地台灣」的人們與「東京」的人們行為相同，她還是認為這是由「看不見的巨大力量」。然而，若以此斷定她反對「皇民化運動」的話，除了有違當時戰爭時期的時代脈絡外，也忽略她作為「中介者」(in-between) 具有的「混雜性」(hybridity)。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出身」的認同與矛盾，展現在其離開台灣前面對神社的態度：

只不過，出發的早晨，不知何故，我以非常坦率的心情站在鳥居下，一邊感受到內心難以壓抑的情感，一邊虔誠地向神殿的方向低下頭。帶著「這或許是最後一面也說不定……」般在離別時的不捨心情，將周圍糊

¹²⁷同前註，頁 169-170。原文：「汽車や電車、或はバスで、美しい風致の中を走っている時、はるか遠くに、白い鳥居がみえる。ああ、ここに神社があるな、と私は思ふのである。すると、私がさう思ふ頃には、車の内の試験勉強に餘念なかつた中學生や、小説本や新聞を讀みふけていた官吏、會社員なぞが、一せいに脱帽して默禮しているのである。私は、何といふことなく、この姿に打たれた。東京のやうに『みなさん只今神宮前を通過いたします』と車掌にアナウンスされる必要のないこの習慣に、何か、眼にはみえない大きな力を感じたのであつた」。

糊的景色與親人們的容顏收藏心裡，低頭的神明鎮座在此令人安心。¹²⁸

儘管真杉靜枝覺得自己與「殖民地台灣」的其他人不同，但此刻卻做出相同的敬禮動作。不過，她在向「殖民地台灣」神社敬禮時，心裡浮現的卻是「家人」的形象。雖然真杉靜枝經常避談自己的「殖民地出身」，但透過與「殖民地台灣」成長的「家」及居住於此的「家人」情感上的連結，亦逐漸消除面對「殖民地出身」的「不安」。

小結

真杉靜枝對於自己「殖民地出身」的「不安」，投射於作品裡的敘述視點。由於她強烈意識到「宗主國」讀者的視線，作品裡的女主人公經常刻意地與「殖民地台灣」的人事物保持距離。然而，這樣的寫作手法並無法隱瞞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灣生」的理解。她在描寫家人與殖民地台灣的時，展現同時具有部分「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灣生／準灣生」的「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而她的台灣書寫並非皆是直接描寫「殖民地台灣」，許多是以描寫居住於「殖民地台灣」的家人為主。雖然真杉靜枝的小說〈ひなどり〉(〈雛雞〉) (1938年) 與〈烏秋〉(1941年)，女主人公皆含有「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但若進一步觀察，會發現其中的差異。她在返台前書寫的〈雛雞〉，女主人公縞代的「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是介於「灣生」(外甥) 與「母國日本人」之間，而返台後書寫的〈烏秋〉裡八重的「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是

¹²⁸同前註，頁 204-205。原文：「しかし、發つ朝は私は、どういふわけか、とても素直な氣持で、鳥居の下に立ち、胸のふくらむやうな押しあげてくる感情を味ひながら、心から神殿の方に頭を下げ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がもう見納め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ふやうな、別れ際の斷ち切れた感情で、どんよりとしたあたりの景色と、肉親達の顔とを心にかき集め、頭を下げる神様が、そこに鎮座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ほっとするやうに有難かつた」。

介於「準灣生」(妹妹照枝)與「母國日本人」之間。透過此「中介者」(in-between)視點，可觀察到「灣生」「不安」與「流離」的情感。

小說〈雛雞〉，可以發現不管對於外甥或是縞代而言，這次的修業旅行都具有特別的意義。就外甥而言，伯母縞代對於自己的關愛，不僅使自己找到與「宗主國」的連結，同時亦找到消除「不安」的可能性。就縞代而言，這次旅行買到的「雛雞」，不僅寄託自己與外甥的親情，同時亦是與「殖民地台灣」的連結。然而，縞代不確定這隻象徵自己與「殖民地台灣」連結的「雛雞」能否被春吉接受。當春吉表示自己喜歡這隻「雛雞」時，縞代心中的「不安」才終於卸下。這部分的描寫反映真杉靜枝對於自己「殖民地台灣」出身的矛盾情感。小說〈烏秋〉，八重與「準灣生」照枝對於「皇民化運動」想法上的對比，凸顯八重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照枝作為公學校教師，是「日本文化」與「本島文化」的「中介者」，在「南進政策」下找到了自我定位。身處殖民地的照枝在面對「殖民地台灣」「在地性」時展現的自信，亦成為長期在「宗主國」生活的八重在面對自己「殖民地出身」時一股安定的力量。

就真杉靜枝個人而言，本章藉由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1940年)裡〈南方の雨〉(《南方之雨》)真杉靜枝對「殖民地台灣」的神社敬拜一事，不僅得以觀察到其作為「中介者」(in-between)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思考，還有面對「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她的「台灣認同」，可以說來自其成長的「家」與居住於此的「家人」。她在作品裡呈現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不僅對於「殖民地台灣」，甚至是對於「灣生」的處境，都表現出不同於「母國日本人」的理解。也或許是這個原因，使得真杉靜枝個人及其文學在「宗主國」文壇成為一個「特別的」存在。

第三章

「未竟的志業」：中山侑的理想與阻礙

前言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台灣總督府的言論管制愈加嚴格。1937年8月日本中央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¹²⁹台灣總督府為了因應時局的變化，1937年9月10日決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實施綱要。¹³⁰並且台灣總督府考慮本島人是與自己的對手中國人屬於同種族的異民族，因此更積極展開一連串消除本島人的中國生活樣式、文化色彩，強制或鼓勵學習日本文化、過日本式生活的改造動員。¹³¹「皇民化運動」被定位為普及本島人「國防思想」的台灣防衛事項之一。¹³²直到1940年7月日本近衛文麿第二次內閣提出「新體制」的概念，台灣戰時的文化才開始復甦。新體制運動主要追求「高度國防國家」，並開始重視思想戰以及文化的政治效用。¹³³「大政翼贊會」作為主要動員機關於1940年10月成立，在提倡「地方文化」與「外地文化」下，對於長期以來壓抑的文化政策進行調整，展開一連串的文藝活動獎勵。¹³⁴隨著日本占有的土地大幅增

¹²⁹柳書琴，〈導言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4。

¹³⁰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162。

¹³¹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58。

¹³²同註130，頁160。

¹³³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198。

¹³⁴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59。

加，使台灣在整個日本帝國的構圖上也有所變動。關於此時期台灣的定位，柳書琴指出：

「台灣人的社會感，也在「帝國擴大化」過程中，隨著地理想像、地域歸屬感，以及戰爭體制不同階段的開展，進一步去中國化，脫國族化，化約為帝國境內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具有從南方出發，聯繫更為南方之地潛力的「南進基地」。地方化、基地化之後，因為在南方地域具有特殊動員優勢，台灣被視為「總力戰體制」下的戰鬥配置，具有帝國一翼的新功能，不再只是帝國猜疑、警戒，必須予以「皇民化」的異己與負擔。」¹³⁵

此時身處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都無可避免地捲入「皇民化」的風潮。中村哲將當時台灣的「皇民化」視為一種「文化政策」，指出「皇民化」的問題在「一個文化如何透過政治指導異質文化」。¹³⁶對此，吳密察認為中村哲的這篇文章可視為台灣新總督對於皇民化政策的調整宣言，是與日本中央近衛內閣的新文化政策呼應。¹³⁷對於當時身處台灣的本島人知識份子而言，「皇民化」帶來「台日文化轉譯」的問題成為熱門的議題。1941年5月《台灣文學》的創刊便是政策風向轉變下的現象。¹³⁸然而，若從今日眼光重新審視當時日本在台灣實施的「皇民化」，事實證明雙方在政治力量明顯的差異上，即使本島人精神上已

¹³⁵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9期（2010年9月），頁114。

¹³⁶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年1月。

¹³⁷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71。

¹³⁸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203。

經非常的「日本化」，終究無法跨越血統或民族上的問題。¹³⁹雖然當時本島人的政治處境未曾改變，但在戰事的宣傳與國策的報導裡，殖民地的奴屬標籤隨著國防任務徵用逐漸淡化，公共報導的密集傳播更擴散這種幻影。¹⁴⁰本島人知識份子「成為日本人」¹⁴¹的過程中，不斷遭遇曲折的認同困境。對於《台灣文學》陣營的知識份子而言，如何在國策下詮釋自我是一大挑戰。而這個現象不限於本島人作家，其中亦包括本章聚焦的對象－「灣生」知識份子中山侑。

中山侑（1909-1959）常被視為與本島人知識份子立場較接近的內地人，原因來自於其與本島人作家同屬《台灣文學》集團，及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西川滿（1908-1999）共同的抨擊。張文環談到《台灣文學》當時創辦的情況時，指出中山侑是最早提案的人。¹⁴²在張文環眼裡，中山侑是具有「人道主義」關懷的內地人作家。¹⁴³然而，中山侑與張文環等本島人知識份子的交好，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嗎？針對此問題，先行研究大多從《台灣文學》偏向「左翼」的立場出發。中島利郎認為中山侑對西川滿文學觀的批判是來自「寫實主

¹³⁹吳佩珍指出「日本人」是「複數人種混血」的主張，除了是企圖賦予帝國對其殖民地統治的正當性外，同時意味著存在解構「日本人」這個概念的危機。日本帝國為了維持殖民地統治的支配優勢，遊走於模稜兩可的「純血論」與「同化政策」的邊緣，利用「純血論」製造「同化政策」及「純血論」間的「差異」。本島人無論如何追求「皇民化」（筆者註：精神上的日本化）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只因「血統」的不純正。「皇民化文學」便成為「純血論」及「皇民化」的「同化政策」互相角力的場所。以上參見吳佩珍，〈血液的「曖昧線」－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3期（2011.10），頁217-241。

¹⁴⁰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9期（2010年9月），頁115。

¹⁴¹荊子馨指出：「日本殖民主義製造的殖民心態的方式，是去留意殖民地知識分子與殖民母國日本關係中的現代性問題。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將「皇民化」的殖民過程與他們對「現代性」的渴望混為一談」。以上參見荊子馨（Leo T.S Ching），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台北市：麥田，2006年），頁51。

¹⁴²張文環，陳千武譯，〈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卷7〕（隨筆集（二））》（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頁64。

¹⁴³同前註，頁67。

義精神」，與黃得時、楊雲萍等本島人作家並無不同，語調卻異常嚴厲。¹⁴⁴鳳氣至純平以中山侑的「藝術大眾化」理念為主軸，認為中山侑在從事藝術活動時常注意到接受者的存在。¹⁴⁵然而，除了上述先行研究從「左翼」的角度思考之外，中山侑與本島人知識分子思想上的交集，是否與中山侑「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及作為「灣生」所處的特殊文化位置有關？為釐清這個問題，本章將先爬梳中山侑在「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軌跡，試圖理解中山侑從事戲劇活動的曲折。而戰爭爆發後，中山侑是如何在國策強勢的主導下，詮釋對於「日本帝國」下「殖民地台灣」人、事、物的思考？此時期中山侑的作品，不僅寄寓其作為「灣生」「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還有對於當時「皇民化」、「內台融合」的回應。究竟他的「不安」為何？而他與《台灣文學》集團的本島人作家的交集又為何？本章將進一步以小說〈ある抗議〉(〈抗議〉)(1941年)與劇本〈客間〉(〈客廳〉)(1942年)為例，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¹⁴⁴中島利郎，許佳璇譯，〈西川滿與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時代〉，《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頁333。

¹⁴⁵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65、87。

第一節 作為「外來者」的「不安」：中山侑的早年活動

1909年3月4日中山侑出生於台北的深坑廳。他的父親中山仁次郎¹⁴⁶是「理蕃警察」，主要負責原住民的相關事務，特別是樟腦的管理。1895年中山仁次郎作為巡查部長渡台，1896年進入南庄撫慰署服務。中山侑的母親是在1897年才帶著中山侑的大姊從內地進入偏遠的南庄。¹⁴⁷父母親作為「草創台灣的開拓者」，在「蕃地」度過20年的生活。¹⁴⁸中山仁次郎於1900年轉調台北樟腦局，1902年調至專賣局的大嵙崁分室，1904年調至專賣局的新店分室，1906年出任深坑廳警務課，1912年轉調專賣局腦務課。據中山侑回憶，他的出生地深坑廳亦是父親最後任職的場所。¹⁴⁹中山侑曾以志馬陸平為筆名在《台灣警察時報》連載〈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討伐故事一父・談論戰慄〉）系列文章¹⁵⁰，對於父親的「理蕃事業」有諸多描述。雖然中山侑不知道領台初期的

¹⁴⁶關於中山侑父親的生平，先行研究都曾提及：中島利郎，〈中山侑という人〉，《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序說》（東京：綠蔭書房，2004年），頁32-53；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星名宏修，〈第五章「樂耳王」と蕃地〉，《植民地を読む：「贗」日本人たちの肖像》（東京都：法政大学出版社，2016年），頁133-172。綜合以上，筆者再根據「台灣總督府職員系統」認為中山仁次郎的仕途與先行研究相符，於此認定。檢自以下網站：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dtdIdStr=000088&viewer.q_fieldStr=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4%B8%AD%E5%B1%B1%E4%BB%81%E6%AC%A1%E9%83%8E&pager.objectsPerPage=25&pager.whichPage=1&viewer.q_dtdId=000088&viewer.q_viewMode=ListPage。（2020.12.03）另外，此處也謝謝口考委員鳳氣至純平老師補充筆者原先疏漏的資料。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可查詢到中山仁次郎完整的履歷，檢自以下網站：<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815530LKQG=1n#2ab6>。

（2022.01.06）

¹⁴⁷中山侑，〈理蕃閑語〉，《理蕃の友》，1936年10月，頁6。

¹⁴⁸志馬陸平，〈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第一話 月光に閃く短槍〉，《台灣警察時報》284期，1939年7月10日，頁84。

¹⁴⁹中山侑，〈理蕃閑語〉，《理蕃の友》，1936年10月，頁6。

¹⁵⁰〈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第一話 月光に閃く短槍〉，《台灣警察時報》284期，1939年7月10日；〈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第二話 狙撃された憲兵〉，《台灣警察時報》286期，

「蕃地」有多危險，但知道父親當時離開內地時是帶著死亡的覺悟。¹⁵¹他在〈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一第二話 狙撃された憲兵〉(〈討伐故事一父・談論戰慄一第二話 被狙撃の憲兵〉)¹⁵²敘述父親一行人嘗試招降原住民最後卻失敗的過程。這個故事不僅揭露父親「理蕃」時的危險與困難，還有母親居住於「蕃地」的「不安」。根據中山侑回憶，母親長年和父親生死與共地生活在不自由的「蕃地」，是需要極大的覺悟和忍耐。即便父親提出希望孩子出生後可以回到內地生活時，母親卻仍主張留在當地至少待到孩子進入小學校。¹⁵³即使是這樣的母親，在碰到突如其來的「蕃人」時仍有極大的恐懼。¹⁵⁴這個恐懼主要源自兩方面：「理蕃」本身的性質與「民族」的差異。從「理蕃」的性質來說，「理蕃」是單方面強行讓「原住民」接受「內地人」所有價值觀的手段，是呈現日／原的二元對立思考。由於這樣的做法並沒有「融合」的空間，衍生出的「對立」自然無法消解，造成「內地人」與「原住民」接連不斷地衝突。從「民族」的差異來說，當時的「內地人」面對「原住民」時是以「文明／近代」的「指導者」自居，而「語言」和「文化」的隔閡更加深「原住民」作為「野蠻人」的猜忌與偏見。中山侑受父親職業的影響，是在這樣危險的氛圍下成長的。「異民族」帶來的「不安」，成為他在「殖民地台灣」成長的一大陰影。故他認為父親的「理蕃」是偉大的事業，是將遠離文明的人們作為新的文明人出發的事。¹⁵⁵這樣的看法不僅表現中山侑從小對於「近代」的嚮往，還有以文明／近代「指導者」自居的心態。

1939年9月10日；〈「父戰慄を語る」改題第三話一タツキリ溪の啞男(一)〉，《台灣警察時報》296期，1940年7月5日；〈蕃界綺譚一タツキリ溪の啞男(二)〉，《台灣警察時報》297期，1940年8月5日。

¹⁵¹同註166。

¹⁵²志馬陸平，〈討伐譚一父・戰慄を語る一第二話 狙撃された憲兵〉，《台灣警察時報》第286期，1939年9月10日。

¹⁵³同前註，頁71。

¹⁵⁴同前註，頁74。

¹⁵⁵中山侑，〈理蕃閑語〉，《理蕃の友》，1936年10月，頁7。

他對「近代性」與「啟蒙意義」的重視很早就體現在對於戲劇的關注。1927年3月他從台北一中畢業後並未入學台北高校，而是擔任台北高校的雇員。他給予1929年台北高校第二屆校慶活動由學生演出的「演劇之夜」很高的評價，原因是具有「本島文化的啟蒙意義」¹⁵⁶。而他在1930年組織的劇團「かまきり座」（「螳螂座」）裡，是屬於「真正以新劇研究團體自居，對導演、演技、舞台、照明各部門都採取研究態度，因此甚至打算犧牲無意義公演的良心派」¹⁵⁷。「螳螂座」解散後，他另組「南の小劇場」（「南方小劇場」）。雖然最後由於中山侑赴日而解散¹⁵⁸，但其欲推行「新劇」的想法此時已初步萌芽。

1932年2月，24歲的中山侑曾前往東京生活兩年。¹⁵⁹他在K氏的介紹下，找到隣保館負責教導孩子童話劇演出的工作。¹⁶⁰對於此時在隣保館從事的「社會事業」，中山侑認為與父親從事的「理蕃事業」類似。他於《理蕃の友》（《理蕃之友》）的〈理蕃閑語〉一文裡，指出兩者除了皆需極大的忍耐力、專注的信念與持續對工作的熱誠之外，前者針對的對象「愚昧無知的民族」，與後者針對的對象「社會的落後者」亦有相似處。¹⁶¹他在隣保館工作期間，不斷察覺自己與孩子們的「差異」。他以《格林童話集》改寫成虛幻的童話故事當作指導孩子的劇本，最後沒有被孩子們接受。¹⁶²後來得知孩子喜歡「英雄崇拜、俠義性

¹⁵⁶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三）—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年5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三）—新劇運動的理想與現實〉，《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3。

¹⁵⁷同前註，頁1。

¹⁵⁸同前註，頁3-4。

¹⁵⁹返台後中山侑將赴日發生的事以〈南千住隣保館追想〉為題，連載於台灣社會事業協會發行的刊物《社會事業の友》。以上參見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35。

¹⁶⁰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社會事業の友》第86期，1936年1月，頁71；〈南千住隣保館追想（二）〉，《社會事業の友》第87期，1936年2月，頁58。

¹⁶¹中山侑，〈理蕃閑語〉，《理蕃の友》，1936年10月，頁7。原文：「相手が無知なる民族であり、蒙昧な社會の落任者である」。

¹⁶²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二）〉，《社會事業の友》第87期，1936年2月，頁59、61。

格、寫實的故事」時，在「蕃地」成長的他立刻想起台灣的原住民傳說《兩個太陽》。¹⁶³然而，當他準備以此撰寫劇本時，卻被同事直接回絕。他才發現這個「差異」並非一開始想的「階級意識」問題，而是實際生活經驗的「生活意識」問題。¹⁶⁴因此，他決定依據孩子的情況，撰寫一部關於貧窮孩子最後制裁富有孩子的劇本。對此，K氏再次反對，指出這些孩子「幾乎沒有從南千住這裡的貧民窟離開過」¹⁶⁵，「對於自己的貧困，並沒有感到任何的自卑或是痛苦」¹⁶⁶。K氏讓中山侑意識到原來孩子是無法理解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階級意識」。中山侑對孩子沒有「自覺」貧窮的困境而感到哀傷。因此，他為了找尋適當方法「啟蒙」這群孩子，不僅選擇移住到南千住地區¹⁶⁷，甚至發行以隣保館孩子為對象的《交隣》¹⁶⁸。雖然結果皆不如預期，但他自承擔任《交隣》編輯期間得知「要以淺顯的用詞，將所有事依據孩子的生活環境簡明連貫地敘述，其困難的程度不亞於寫篇不完整的論文」¹⁶⁹。中山侑的失敗其實不僅因為「階級」的差異¹⁷⁰而已。他與隣保館孩子們間，還存在「大人／小孩」、「城市／鄉下」、「宗主國／殖民地」等諸多差異。儘管此時他費盡心力想理解這群孩子，但始終難以跨越與孩子們的界線。原因在他始終是以「自己」的角度看待「孩子」的一切，與孩子的交流是「單向的」。而他作為「外來者」，更加深彼此隔

¹⁶³同前註，頁 61。

¹⁶⁴同前註，頁 62。

¹⁶⁵同前註，頁 63。原文：「彼等は此の南千住の細民街から、殆んど一步も外へは出ていないのだ」。

¹⁶⁶同前註，頁 62。原文：「此處らの子供は自分が貧しいと言ふ事に、何の苦痛も引け目も感じていないと言ふのだ」。

¹⁶⁷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四）〉，《社會事業の友》第 91 期，1936 年 5 月，頁 50。

¹⁶⁸同前註，頁 54。

¹⁶⁹同前註，頁 55。原文：「平易な言葉で、あらゆる事實を平明に、彼等の環境に例をとってまとまりをつけて述べて行く事のむつかしさ、生半かな論文を書く事より努力が入るものである」。

¹⁷⁰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的戲劇論述－藝術理念和政策之間的協力關係及其糾葛〉，《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 年），頁 243。

閱。對此，他亦曾深感「不安」。¹⁷¹而這次的失敗經驗亦讓他在日後的戲劇活動開始察覺到「接收者」與「在地性」的問題。

返台後的中山侑為了活用在東京得到的新劇運動經驗，加入以前組織的「南の小劇場」（南方小劇場）改稱的「台北演劇集團」。¹⁷²他在赴日期間親眼目睹東都新劇壇的真實樣子，從「築地座」開始，四處窺探各種劇團後台內幕。¹⁷³或許這次的經歷使他作為「島民」更加察覺「殖民地台灣」相較於「宗主國」在文化的「落後」，因此更加積極推動「殖民地台灣」的「新劇運動」。此外，中山侑認為「殖民地台灣」本身的「在地性」亦為「新劇運動」的推動帶來先天上的優勢。他指出「殖民地台灣」的人們由於沒有受到「歌舞伎」或「新派劇」等「傳統日本文化」渲染的影響，理解「新劇」的速度應該會更快。¹⁷⁴直到 1934 年 2 月首次「新劇祭」前，中山侑對於「新劇」在「殖民地台灣」的推動都極為樂觀。雖然「新劇祭」最終的失敗凸顯中山侑對於「殖民地台灣」認知上的不足，但作為中山侑在文化活動方面正式和本島人聯繫的端緒¹⁷⁵亦帶來諸多啟發。他從「民烽劇團」主持人張維賢身上得到重要啟示：「在人的世界裡，有跨越民族藩籬的共通思想和共通的生活問題，只不過風俗習慣為它們塗上了色彩。每一個民族都以不同形式擁有這種共同的想法和問題」¹⁷⁶。中山侑此處說的「共同的思想」，是指對於「近代性」的追求。儘管張維賢與中

¹⁷¹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二）〉，《社會事業の友》第 87 期，1936 年 2 月，頁 60。

¹⁷²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三）—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 年 5 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三）—新劇運動的理想與現實〉，《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 年），頁 7。

¹⁷³同前註，頁 4。

¹⁷⁴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六）—藝術運動の再吟味〉，《臺灣時報》（1936 年 9 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六）—藝術運動之再省思〉，《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 年），頁 142。

¹⁷⁵鳳氣至純平，〈中山侑の戲劇論述—藝術理念和政策之間的協力關係及其糾葛〉，《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 年），頁 245。

¹⁷⁶同註 174，頁 145。

山侑對於「近代性」的詮釋有「同床異夢」¹⁷⁷的可能，但此時的中山侑意識到原來對於「近代性」的追求不僅限於「內地人」，還包括「異民族」的「本島人」。而「本島人」在推行「新劇」時，同樣面臨到與中山侑「共同的問題」——「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然而，張維賢清楚指出「日本內地」與「本島」觀眾層存在的文化差異。¹⁷⁸這點已超越中山侑原先思考的「階級」與「民族」的層次，將問題意識提升至「宗主國」與「殖民地台灣」的差異，帶給中山侑極大的刺激。中山侑從「民烽劇團」選擇「台語」將上演的劇本全部改編成符合本島民情內容的行為¹⁷⁹意識到「文化轉譯」的重要性。他認為「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建設不能只停留在「宗主國式的」，而是要具有融合「殖民地台灣」在地文化的「混雜性」(hybridity)。此刻的他找到自己在「殖民地台灣」作為「灣生」的責任，試圖將「文學、美術、音樂、演劇、電影」皆和「台灣」結合，並推廣至「近代人所謂的『現代風』」。¹⁸⁰然而，他對於「殖民地台灣」佔據多數的「異民族」仍舊感到「不安」。從他對於「台語」的想法可以見到：「語言不只是字面的意義和聲調的表現而已，在語言的深處隱藏著民族性的一切」，「為了促使他們能正確而徹底理解某個問題或思想」，「是沒有任何語言

¹⁷⁷關於「同床異夢」一詞，陳培豐指出：「統治者一直試著稀釋、被統治者卻無時無刻都想增強的「同化於文明」，反而較「同化於民族」更來的輪廓鮮明」，「日治時期的「近代化」，是本島人積極、過濾性和選擇性地攝取統治者為了維持國家體制平衡而提出的統治策略——國語教育內的「同化於文明」之要素後，所產生的結果」。以上參見陳培豐，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頁473。

¹⁷⁸同註174，頁144。

¹⁷⁹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四) — 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年6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四) — 新劇運動的理想與現實〉，《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63。

¹⁸⁰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一) — 藝術運動の再吟味〉，《臺灣時報》(1936年2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一) — 藝術運動之再省思〉，《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382。

能勝過他們的傳統語言的」¹⁸¹。

第二節 建設「台灣」文化的困境與動力：小說〈抗議〉¹⁸²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台灣總督府對文化界的管控愈加嚴格。1937年9月10日台灣總督府決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實施綱要。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方向主要以貫徹戰爭宣傳及貫徹至今的民風振興運動，使其滲透至島民生活的細部為目標。¹⁸³「台灣劇」與「台灣音樂」的改善與「陋習之改善」並列，成為「殖民地台灣」「精神總動員」的核心工作事項。¹⁸⁴「皇民化劇」亦成為政策主要提倡的目標，目的是「讓民眾理解崇高的皇國精神，並徹底普及『惟神之道』」。¹⁸⁵1937年7月中山侑進入台北放送局工作。¹⁸⁶呂紹理指出，1937年台灣當局為了將本島人轉化為「皇國國民」，演講內容以凝塑日本為中心的國民意識

¹⁸¹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六）—藝術運動の再吟味〉，《臺灣時報》（1936年9月）。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青年與臺灣（六）—藝術運動之再省思〉，《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144-145。

¹⁸²原文刊於《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年5月。本章採用中譯版由涂翠花譯，〈抗議〉，收錄於王德威、黃英哲主編，《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年），頁154-175。

¹⁸³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162-163。

¹⁸⁴石婉舜，《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頁122。

¹⁸⁵石婉舜指出：「1940年2月江間常吉認為「皇民化劇」應涵蓋「納稅宣傳、防火宣傳、國語普及、公眾道德、時局認識、風習風俗改善、衛生思想普及、防諜、防犯、犯罪更生保護」等目的。他的《皇民化劇の手引》（《皇民化劇入門》）不是一本單純的『現代劇場實務指南』而已。他以「皇民化劇」全面取代「台灣戲劇」的主張，挾其完整論述與實踐方法，於在台日人間的感染力是巨大的」。以上參見同前註，頁123-125。

¹⁸⁶星名宏修，〈第五章「樂耳王」と蕃地〉，《植民地を読む：「贗」日本人たちの肖像》（東京都：法政大学出版社，2016年），頁160。

為主，而內容完全由總督府情報課提供。¹⁸⁷這與中山侑先前的追求有所落差。戰爭爆發前，中山侑的目標是以具有「啟蒙意義」與「近代性」的娛樂為主軸，試圖建設脫離「宗主國式」的單一思考，並融合「殖民地台灣」在地文化而成的「台灣」文化。然而，對於時下局勢的轉變，他首先觀察此時「宗主國」內部的情況。他指出在戰爭動員下，過去與「新劇」無緣的平凡大眾開始觀看「新協劇團」與「新築地劇團」充滿「時事色彩」的公演。他對於這些人能否從戲劇裡得到最基本的「娛樂性」，甚至讀懂其中「作為近代人」的啟蒙思想抱持懷疑的態度。並且他指出這些戲劇對於原本從事藝術工作的知識份子反而得不到心靈上的安慰。¹⁸⁸而回到「殖民地台灣」的情況，不只有「近代化」，還有「皇民化」的問題，這樣的看法亦反映在他對於「皇民化劇」的評論。他認為既有的「皇民化劇」「並非正確的戲劇」，有「檢討劇本、演出、演技等方面」的必要。¹⁸⁹他再次強調「殖民地台灣」的人們對於「娛樂」的認知絕對不會和「宗主國」一樣。¹⁹⁰事實上，類似的看法亦存在於當時部分的本島人知識份子¹⁹¹，例如張文環（1909-1978）。當時張文環在看完〈飄落的花〉的戲劇後，透露對於「皇民化劇」要作為「現代戲劇」，並且「持有正確的社會常識」的期

¹⁸⁷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市：遠流，1998年），頁170。

¹⁸⁸ 志馬陸平，〈時局下台灣の娛樂界〉，《臺灣時報》（1940年1月15日）。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時局下的台灣娛樂界〉，《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451。

¹⁸⁹ 中山侑，林信甫譯，〈日有所感—關於皇民化戲劇〉，《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485。

¹⁹⁰ 同註188，頁453。

¹⁹¹ 邱坤良指出：「皇民化運動期間，描寫民間生活與地方議題的劇本明顯增加，甚至成為政治教化劇必然的場景。因此，描寫台灣，反映「民眾生活」已非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在於，以台灣為題材的創作劇本，能否符合舞台演出條件，除了政治教化性之外，是否具有娛樂性、群眾性，甚至藝術性」。以上參見邱坤良，〈戰時在台日本人戲劇家與台灣戲劇—以松居桃樓為例〉，《戲劇學刊》12期（2010年7月），頁14。

許。¹⁹²這與中山侑評論「皇民化劇」時有相似處。對於中山侑而言，此時的張文環成為他在建設「台灣」文化的路上一個堅定的盟友。對於「皇民化」，張文環認為時勢下的戲劇必須「要考慮日本精神運動的理論，到移入實踐的具體方法」。¹⁹³他與中山侑都指出當前「皇民化」的問題是「日本帝國」下身處「殖民地台灣」人們具有的「在地性」。或許由於雙方對於「台灣」文化抱有相似的想像，1940年擔任《文藝台灣》編輯委員的中山侑與張文環、陳逸松、王井泉等人於1941年5月另創《台灣文學》。¹⁹⁴同年6月中山侑的小說〈ある抗議〉（〈抗議〉）在《台灣文學》創刊號刊出。小說登場人物社長蔡君以謝火爐為原型、劉君以王井泉為原型、市會議員兼醫師的T君以陳逸松為原型、作家王崑山以張文環為原型、七八年前在大稻埕燃起新劇運動烽火的C君以張維賢為原型。¹⁹⁵

〈ある抗議〉（〈抗議〉）主要描寫男主角公助參加由本島人知識份子主辦的宴會的過程。公助在宴會裡透過與本島人知識份子的談話，理解到他們對於時下文化的不滿。王崑山告訴公助決定組劇團的目的，是針對「對我們的文化或娛樂沒有任何正確認知的，說難聽點，就是無知的傢伙，正打算利用文化的名義，號召一無所知的群眾」（〈抗議〉，頁167-168）的現在某劇團。這番話不僅表現這群本島人知識份子不滿於現時的文化運動忽略了「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還有「娛樂」的「近代性」。對此，公助亦深有同感。公助指出「他眼前浮現愚蠢的皇民劇的舞台表演之類，把所謂皇民鍊成運動扭曲到極點的一面。忘了文化氣

¹⁹²張文環，陳千武譯，〈論台灣的戲劇問題〉，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卷6〕（隨筆集（一））》（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頁31-32。

¹⁹³同前註，頁31-32。

¹⁹⁴關於《台灣文學》的創刊及文學理念，柳書琴指出：「是一批對西川滿及《文藝台灣》路線不滿的台、日人作家，利用大政翼贊運動扶持「地方文化」的機會，從《文藝台灣》脫退並另創《台灣文學》，並企圖以本土現實主義文藝的復興別開生面」。以上參見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頁200。

¹⁹⁵石婉舜，《一九四三年台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頁45。

息，形成粗製濫造的娛樂，和大眾的感覺有距離的矯揉造作的人生，這類戲劇脫離了正確的皇民鍊成運動的本質，多麼讓有心的本島人們憂心忡忡」（〈抗議〉，頁 161）。

然而，儘管公助對於時下「台灣」文化的建設與本島人知識份子有相似的理念，但同時亦流露出對於他們背後「民族意識」的「不安」。雖然公助認為此時在國策強力主導下，眼前這群本島人知識份子「毫不寬貸地檢討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所有事物，推敲其中的真意，努力逼近一個國民的正確自覺的類型」（〈抗議〉，頁 166），但對於從小成長於危險「蕃地」的他而言，不禁覺得：「為了以皇民的身分站起來，他們要切割多少強大而難以切割的事物？」（〈抗議〉，頁 174）。而這個作為「外來者」的「不安」在公助從事文化運動時亦不斷出現。公助在小說裡自承：「不太清楚大稻埕髒亂的後街、寺廟名稱和陋巷的民間故事，可是憑著他們幾年的交情，他自認特別了解住在那裡居民的心情」（〈抗議〉，頁 173）。他在面對「殖民地台灣」的「其他本島人」時，是透過這群本島人知識份子才自認理解的。這點從〈抗議〉整篇小說的架構可以察覺。公助在整篇小說裡皆是被本島人知識份子引導，是作為賓客被招待。從最初劉君的電話，到後來王崑山「今晚算是招待員，而不是應邀而來的賓客」（〈抗議〉，頁 160），都可見到這場宴會是這群本島人知識份子主導一切。這些關於「近代」的事物都必須仰賴劉君穿針引線，與其他人講解。雖然公助與本島人知識份子間存在「民族」的隔閡，但彼此在「文化認同」的貼近使其逐漸消除內心的「不安」。小說〈抗議〉，公助遭遇的場景，從最初劉君用電話邀請男主角公助參加由「波麗露輕音樂團」的同仁舉辦的音樂聚會裡「一貫的粗魯說法，聽起來很刺耳」的日語，到公助抵達蔡家後見到的場景佈置：「打開門，右邊平常好像用來做客廳。今晚，應邀而來的賓客們各自坐在椅背很深的長椅子和坐墊上，陶醉地聽著在隔壁起居室排排站的樂團成員的演奏」（〈抗議〉，頁 158），和「樂團正在演奏的房間，好像是家人們餐後喝茶休息的地方」（〈抗

議》，頁 159），都充滿強烈的「混雜性」（hybridity）。面對這些場景，公助非但沒有感到突兀，反而認為是「不常體驗到的，令人覺得溫馨的祥和景象」（〈抗議〉，頁 159）。他之所以感到「溫馨」，是因為看到本島人知識分子們不僅表現出對於「近代性」的追求，還有試圖以「殖民地台灣」「在地」方式呈現的一面。從以 20 年代後半流行於美國的樂曲〈波麗露〉作為「波麗露輕音樂團」的樂團名稱、以蔡君的洋房作為宴會場地、演奏著樂團最拿手的 1934 年發表的百老匯歌曲〈藍月〉都可見到這些象徵進步與現代性的文化記號。¹⁹⁶而他在這場宴會裡見到的市會議員兼醫生的 T 君、擔任《民報》記者以「思想先進」名噪一時的 L 君，及身為作家和對文學有熱忱的王崑山，這些人帶有的「近代性」亦使其感到放心。也因如此，當公助從劉君身上看到「對文化的熱情」及從王崑山身上看到「對時代的慎重」時，自己亦找到作為「灣生」繼續指導建設「台灣」文化的動力。他表達對於未來「台灣」文化的願景，認為「當兩者互相融合成一體，而開始往前走時，這個城鎮的文化才能發展成扎根在現實中的，一種堅定而正確的文化潮流吧」（〈抗議〉，頁 174）。

第三節 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劇本〈客廳〉¹⁹⁷

中山侑的劇本〈客間〉（客廳）分為三幕，第一幕刊載於 1942 年 2 月的《台灣文學》，第二幕、第三幕則刊載於同年 3 月的《台灣文學》。這個劇本的登場人物有幾個重要的原型：大稻埕的執業律師、曾出資辦文學雜誌的林清月是以陳逸松（1907-1999）為原型，而有正職、並且在業餘時間投入青年劇運動的田上熊生

¹⁹⁶楊智景，〈解題〉，《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 年），頁 266。

¹⁹⁷第一幕：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 卷 1 號，1942 年 2 月，頁 213-226；第二幕、第三幕：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 卷 2 號，1942 年 3 月，頁 106-125。

是以作者中山侑本人為原型。¹⁹⁸

〈客間〉主要描述大稻埕的本島人知識份子林清月，為了能使自己更貼近「國民」的生活，不僅努力過著日本式的生活，更不顧本島人好友李炎生的勸告，試圖透過「內台共婚」的方式，堅持將妹妹月霞許配給不同民族的內地人，最後失敗的過程。然而在這部劇本裡，中山侑亦展現對於自己「殖民地台灣」出身及「灣生」身分的思考。

中山侑在劇本〈客間〉裡，著重描寫田上熊生，與本島人女子月霞、內地人女子磯江京子三者的關係。月霞雖然是「本島人」，卻是在精神上「近乎日本化」的「本島人」。故事開頭月霞突然想停止學習花道，並返回鄉下老家。因為她認為自己的「本島人」身分在「內地人」眼中是「特別」的存在。¹⁹⁹然而，對於月霞的想法，清月非常不諒解。清月希望月霞能夠為了自己成為「國民」的目標忍耐眼前的艱困，並認為問題是出在月霞「總是太過於侷限在身為本島人的女性的意識」（〈客間〉，頁 216）²⁰⁰。正好此時，清月律師事務所的女員工磯江京子前來拜訪。對於清月與月霞間的問題，京子認為月霞是由於走著清月給予自己所規劃「成為日本人」的道路，並不知道目的地在何處而感到不安。²⁰¹清月為了使自己能更貼近「國民」生活，一路有意栽培月霞，將月霞送至日本東京念書。然而，到東京生活後，月霞內心的矛盾逐漸產生。當月霞親自拜訪田上熊生後，說出以下這番話：

起初，我在東京的學校念書時結交許多朋友，沉浸在希望和幸福之中而感到高興，完全忘了自己遠離台灣而來，以及等待著我回去的哥哥。忽

¹⁹⁸吳宗佑，《「民眾」的戲劇實踐：以日治時期日台知識人的劇本創作為中心（1923-194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頁 75。

¹⁹⁹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頁 215。

²⁰⁰原文：「本島人の女だと言ふ意識に何時も拘はりすぎているのだ。」

²⁰¹同註 199，頁 219。

然間，在那時，我環視著自己的周圍，注意到自己不能和他們一起沉溺於這樣的時光。不知道為何，我開始覺得自己與大家，至今為止在一起的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每當我天真的和朋友們聊著自己出生的島嶼和雙親的話題時，可以說更深刻地感受到那種感覺。²⁰²

「殖民地台灣」的出身及「本島人」的身分成為月霞的雙重包袱。作者中山侑除了藉此表現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歧視是努力追求「國民」生活的本島人最大的阻礙外²⁰³，也揭露「殖民地台灣」出身的劣等感。故事的後半，田上熊生坦承自己無法與月霞結婚，原因是遇見了「阻礙」—磯江京子。²⁰⁴這表現出田上熊生對於「民族」的問題仍存有「不安」。不過，磯江京子也並非普通的「內地人」，而是與「本島人知識份子」林清月一家的淵源頗深。京子的父親是林清月的恩人。林清月認為自己能獲得今天的社會地位，是有賴於京子的父親。林清月將京子看作是「我們家族的一人」（〈客間〉，頁 218）²⁰⁵。京子也十分感謝清月一直以來的照顧。她感謝清月「使失去父親成為孤兒的我，能夠以女子之身奢侈地接受高等教育」（〈客間〉，頁 218）²⁰⁶。正因為京子與林清月一家關係

²⁰²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2號，1942年3月，頁115。原文：「その一番はじめは、東京の学校のいる時でした沢山のお友達に囲まれ、希望と幸福で一杯ではね廻っていました。遠く離れて来た台湾の事も、私をまっけてくれる兄の事も、すっかり忘れていたのです。ふと、その時、私は自分の圍りを見廻してみました。そして、自分は皆と一緒にこんなに無中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のだと気づいたのです。何故か知りません、併し、今まで一緒にいたお友達が、皆、私と全然違ふ人の様な気がして来たのです。私が甘えた気持一杯でお友達とお話をしている時生まれ島の話や親の話なぞが出る度に私は、その気持を深くして行ったのだと言へますわ」。

²⁰³吳宗佑，《「民眾」的戲劇實踐：以日治時期日台知識人的劇本創作為中心（1923-194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頁76。

²⁰⁴同註202，頁121。

²⁰⁵原文：「私を貴方を私達の家族の一人と思っ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²⁰⁶原文：「父を失った身なし子の私が、女の身にぜいたくな高等教育など受けさせて戴いて」。

深厚，京子非常同情月霞的遭遇，同時亦感念林清月對自己的栽培，所以選擇主動放棄自己與田上熊生的情感。因此，直到最後，田上熊生都未與月霞或磯江京子在一起。而這樣的結果亦與田上熊生本身的猶豫有關，象徵作者中山侑此時對於自己「灣生」身分的思索：究竟「殖民地台灣」出身，和「內地人」的身分，如何並存？

結局裡，月霞與磯江京子一同返回「下了火車後，搭乘製糖公司的小火車二十分鐘，然後再搭一小時的軌道車，戶數僅僅只有三十戶的部落，只懂得臺灣話的祖父母的家」（〈客間〉，頁 215）²⁰⁷。月霞最終寫給清月的信中，提到自己與磯江京子「認為兩人一起思考，帶著勇氣向前邁進」²⁰⁸。此時月霞扮演主導的角色，帶領京子前往自己偏遠的故鄉。返回「殖民地台灣」的鄉下這件事，對於月霞和京子而言，各有不同的涵義。相較於「都市」象徵的「宗主國」，「鄉下」更具有「殖民地台灣」「在地」的意涵。正因為月霞受過完整的日本近代教育，還有京子對於「本島人」的理解，所以兩人在「文化認同」上得以產生交集。對於月霞而言，她不必再以成為「近似母國的日本人」為目標。對於京子而言，她不必再因「本島人」和「內地人」間「民族」衍生的問題而捨棄自己的情感。而京子雖然作為「內地人」，但在月霞的陪同下，或許能夠進一步察覺到過去在「殖民地台灣」難以看清的「在地性」。

²⁰⁷原文：「汽車から降りて、製糖會社の輕便鐵道で二十分、そこから又トロッコで一時間もかかる、戸數僅か、三十戶の部落、本島語しか知らないお爺さんとお婆さんのいる家だぞ」。

²⁰⁸原文：「二人で一緒に考へ、勇氣を持って進まいと思ひます」。

小結

本章首先試圖以線性發展的軌跡來捕捉中山侑早年在戲劇活動的曲折。中山侑作為「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日本人」，不論是身處「異民族」佔據多數的「蕃地」裡，或是身處文化認同「不完全」相同的「宗主國」，都存在一種作為「外來者」的「不安」。他作為「理蕃警察」之子，從小在「蕃地」成長。「蕃人」帶來的「不安」，促使他產生對於「近代」的嚮往及以文明／近代「指導者」自居的心態。而他在赴日期間，不僅察覺到「接收者」與「在地性」的問題，還有作為「島民」文化落後的焦慮。返台後，雖然首次「新劇祭」的失敗凸顯中山侑對於「殖民地台灣」認知的不足，但同時張維賢主持的「民烽劇團」帶給他極大的啟示。中山侑發現「文化轉譯」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灣生」的使命。此刻的他已認知到「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建設不能只停留在「宗主國式的」，而是要具有融合「殖民地台灣」在地文化的「混雜性」。

到了 1937 年戰爭爆發後，此時「娛樂」的探討不僅「近代性」，還有「皇民化」的問題。而此時的中山侑依舊強調「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並同樣重視戲劇裡的「近代性」。這與當時的本島人知識份子張文環抱有類似的看法。或許兩人在理念上的契合亦促成 1941 年 5 月《台灣文學》的誕生。而中山侑在《台灣文學》發表的小說〈抗議〉和劇本〈客廳〉，不僅反映其作為「灣生」的「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還有未來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與「台灣人」的展望。小說〈抗議〉，可以發現公助面對「殖民地台灣」的「異民族」時「不安」與「流離」的情感。對於公助而言，他作為「內地人」，面對「殖民地台灣」多數的「本島人」是帶有強烈的「不安」。然而，他在從事文化運動的過程，透過與本島人知識份子的交流，逐漸找到消除內心「不安」的可能。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近代性」的追求，及對於「殖民地台灣」「在地性」的重視，都與公助的想法貼近。而公助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對於

「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共同想像，亦使公助找到繼續指導建設「台灣」文化的動力。這反映中山侑長期在「殖民地台灣」從事文化運動的矛盾。劇本〈客廳〉，田上熊生並未選擇月霞與京子，某種程度反映此時其對於「民族」問題的「不安」。然而，結局裡，月霞帶著京子返回「殖民地台灣」偏遠的鄉下。兩人在「文化認同」的交集使京子能在最具「殖民地台灣」「在地性」的鄉下生活。這樣的安排或許是中山侑對於自己「灣生」身分認同的解答，呈現其未來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

儘管中山侑小時候在「蕃地」感到極度的「不安」，但在成長的過程裡逐漸找到與「殖民地台灣」的連結。他透過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契合，逐漸消除內心的「不安」。而他建設「台灣」文化的理想及作為「台灣人」的展望，皆隨著戰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一同消逝，成為「未竟的志業」



第四章

尋根之旅：戰前至戰後龜田惠美子的台灣「鄉愁」*

前言

紀錄片《灣生回家》²⁰⁹的問世，使台灣學界曾掀起一波「灣生」的研究熱潮。然而，由於《灣生回家》太過強調戰後「灣生」對於台灣的「鄉愁」，反而忽略了戰前「灣生」作為「殖民者」的歷史背景，最後造成「鄉愁」去脈絡的解讀。若欲論及戰後「灣生」對於「台灣」的情感，不能只是聚焦在「灣生」對於台灣「鄉土」的認同而已，而是應該要考慮到「灣生」戰前的「殖民經驗」及戰後時空背景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本母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的「日台」關係，轉變為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的「日華」關係。此時的台灣已不能再視為昔日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當「灣生」作為「日本人」再度重返「台灣」時，比起「鄉愁」，感受更多的或許是「疏離感」。然而，這種「疏離感」並非只出現在戰後「灣生」返台的過程。類似的「疏離感」亦出現在戰前「灣生」離開「殖民地台灣」返回「宗主國」的過程，與「灣生」本身所處的特殊文化位置有關。而戰前與戰後脈絡上的差異，亦使書寫裡「故鄉」與「鄉愁」的涵義產生微妙的變化。

*本章草稿曾發表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政大台文所主辦之「台灣文學與東亞工作坊」，獲評論人星名宏修老師諸多寶貴意見。後來以〈「故鄉」或「他鄉」？：論龜田惠美子及其作品的台灣鄉愁〉為題發表於《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2020 年 6 月），頁 1-28，承蒙匿名審查人之修改意見，致使本章內容更臻完整。筆者受益甚多，特此致謝。

²⁰⁹黃銘正導演，陳宣儒監製，紀錄片《灣生回家》，2015 年 10 月 16 日於台灣上映。

「故鄉」的認知會關係到自我的認同，從戰前的「殖民地台灣」至戰後的「中華民國台灣」，「灣生」是如何在不同階段的書寫裡呈現對於「故鄉」的思考？並且，「灣生」的身分與經驗是否影響其戰後對於「殖民地記憶」的回顧？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本章欲聚焦於「灣生」作家龜田惠美子（1921-2014）及其戰前與戰後的作品。關於龜田惠美子的生平，過去一直沒有足夠的資訊。直到2017年，透過龜田惠美子的孫子黑羽夏彥在部落格書寫的系列文章：〈「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一）～（三）〉（〈關於「灣生」祖母（一）～（三）〉）²¹⁰才得以瞭解龜田惠美子從戰前至戰後完整的面貌。本章首先將梳理龜田惠美子在戰前至戰後的活動，透過刻劃龜田惠美子的生平，有助於理解其作為「灣生」戰前與戰後的經驗。接著，進一步解讀龜田惠美子戰前的自傳體小說〈〈ふるさと寒く〉〉（〈故鄉寒冷〉）與戰後的散文集《旅の朝》（《旅之朝》）的台灣書寫。透過比對觀察〈〈ふるさと寒く〉〉（〈故鄉寒冷〉）與《旅の朝》（《旅之朝》），除了能發現龜田惠美子從戰前至戰後書寫裡「故鄉」與「鄉愁」涵義的轉變外，還有其戰後作為「灣生」對於「殖民經驗」的回顧。

²¹⁰黑羽夏彥，〈「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一）～（三）〉，（來源：<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377.html>，2017年8月16日）。而作家一青妙曾於台南採訪黑羽惠美子之孫黑羽夏彥先生。黑羽夏彥近年來致力於日治時期台灣作曲家與聲樂家江文也的相關研究，並訴說自己對台灣歷史關心的緣由來自祖父母。他從祖母（黑羽惠美子）口中聽到許多關於台灣的事情，並透露祖母已於2014年逝世的消息。以上參見一青妙著，張雅婷譯，〈移居台南的個性派日本人〉，《我的台南：一青妙的府城紀行》（台北市：聯經，2015年），113頁。筆者將上述資料作為表格，附於本論文末的〈附錄〉方便閱讀。

第一節 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1921-2014）生平

龜田惠美子，1921年出生於台北淡水，本籍為本州廣島。父親龜田主一²¹¹是總督府下級官吏。龜田惠美子早年跟隨父親調職，先後進入羅東附近的分教場、基隆高等女學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補習科。就讀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補習科期間，透過恩師濱田隼雄的介紹認識西川滿，於《華麗島》創刊號發表第一篇作品〈返信〉²¹²，並加入後來的《文藝台灣》集團。1939年畢業後取得「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的教師證書²¹³，隨後任職於台北市南港公學校，擔任教師一職²¹⁴。1940年辭去公學校教師一職後，適逢戰爭時期，男性出征，因人手不足，女性求職並不難，反覆換了幾份工作，期間發表〈街〉²¹⁵於《文藝台灣》。同年秋天，利用父親一個月的休假期間，與其一同返回故鄉廣島。此次返鄉之旅是龜田惠美子有生以來第一次踏上內地的領土，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成為小說〈ふるさと寒く〉²¹⁶（故鄉寒冷）的原型。戰後龜田惠美子重新回憶此事，並記下〈山の匂い〉²¹⁷一文收錄於散文集《旅の朝》。1941年11月7日

²¹¹ 龜田主一曾於多處郡役所庶務課任職，歷經淡水（1920-1928）、羅東（1929）、基隆（1932-1937）、七星（1938）等地，最後升官至台北市內務部（1939-1940）、文山郡役所勸業課（1941）。引自中研院台史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9年10月22日）。

²¹² 龜田惠美子，〈返信〉，《華麗島》創刊號，1939年12月。

²¹³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綜合資料：彙報（宗教及學事）〉，《台灣總督府府（官）報》，1939年5月31日。引自「台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7/list1.php?KW1=%E9%BE%9C%E7%94%B0%E6%83%A0%E7%BE%8E%E5%AD%90&PG1=&ID1=&TY1=1&R ecKW=1>，2021年5月4日）。

²¹⁴ 中研院台史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9年10月22日）。

²¹⁵ 龜田惠美子，〈街〉，《文藝台灣》，第2卷6號（1941.9），頁44-45。

²¹⁶ 龜田惠美子，〈ふるさと寒く〉，《文藝台灣》第2卷第4號（1941年7月），頁36-61。

²¹⁷ 黑羽惠美子，〈山の匂い〉，《旅の朝》，頁126-131。

父親龜田主一於新店溪發生的船難事件中溺水身亡²¹⁸。1942年4月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書記身分前往香港。1943年2月因日本在戰爭中逐漸喪失制海權，從香港返回台北。1944年以雇員身分任職於總督官房情報課，進入《台灣時報》工作。隨後發表以香港之旅經驗為題的〈思ひ出の街〉²¹⁹、〈九龍生活〉²²⁰。同年與台北第二中學校教師黑羽義治結婚，從「龜田惠美子」改名為「黑羽惠美子」。1945年8月日軍投降前一週，台北的自宅遭到空襲損毀²²¹。1946年3月從基隆港被遣返回日本。1983年從日本返回台灣參與基隆高等女學校（今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舉辦的同學會。同年再訪香港，參觀當年待在香港時所住的宅邸。1986年以「黑羽惠美子」之名發表散文集《旅の朝》²²²，部分篇章提及過去的台灣經驗。2014年過世。

第二節 介於「故鄉」之間：〈故鄉寒冷〉²²³

〈故鄉寒冷〉發表於1941年7月《文藝台灣》，主要描寫「灣生」女性勢子與父親一同返回內地故鄉的過程。而透過戰後《旅の朝》的〈山の匂い〉（〈山的氣味〉）可以佐證，〈故鄉寒冷〉是以1940年秋天龜田惠美子與父親返鄉之旅作為原型。〈故鄉寒冷〉可以見到勢子在返鄉之旅中，透過親身體驗，與觀察父親與內地親屬間的互動，逐漸摸索並確認自己的故鄉意識。故事大綱簡述如下。勢子的父親二十三年前自內地來台後，除了「內心潛藏激烈的鬥志」

²¹⁸ 龜田主一時年49歲，關於龜田主一身亡，龜田惠美子在〈山の匂い〉一文中提到。事件詳情可見〈新店溪下りの屋形船顛覆 河野台北市商工係長等三名溺死〉，《台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9日。

²¹⁹ 龜田惠美子，〈思ひ出の街〉，《台灣公論》，1944年5月，頁23-24。

²²⁰ 龜田惠美子，〈九龍生活〉，《台灣時報》，1944年6月，頁40-47。

²²¹ 黑羽惠美子，〈夏の涙〉，《旅の朝》，頁76-80。

²²² 黑羽惠美子，《旅の朝》（東京：日本隨筆家協會，1986年）。

²²³ 原文刊於《文藝台灣》第2卷第4號（1941年7月）。本章採用東方文化書局影印復刻本。

(〈ふるさと寒く〉, 頁 37)²²⁴外, 「盡心盡力、默默且踏實地一路走來」²²⁵, 最後在「輾轉之中反覆經歷挫折之後, 總算爬上官界的末端」²²⁶。而他至今無法回到內地的理由, 「與其說是離不開公務, 不如說是沒有經濟上的餘裕」。²²⁷到了將近五十歲的他, 終於有了足夠的錢往返內地與台灣之間。雖然他知道「就算回去也幾乎沒有認識的人」²²⁸, 與「堅定埋骨台灣的覺悟」²²⁹, 卻又非常渴望見到「長時間忘卻的故鄉與老母親」²³⁰。在妻女的勸告下, 終究還是決定前往內地。回到內地後, 因為「父親沒有家, 是在母親娘家長大成人的」(〈ふるさと寒く〉, 頁 39)²³¹, 所以先返回母親的娘家。祖母【筆者註: 父親的生母】也從山中來到母親的娘家與父親見面, 這也是父親自二十三年前「接到曾祖父去世的電報後飛速地返鄉」²³²後首次見面。兩人在母親的娘家中都十分拘謹且客氣。祖母帶父親前往歷代祖先的墳前祭祖, 歸途中遇見父親的兒時玩伴萬助。後來父親與外祖父【筆者註: 由於父親是入贅當養子, 外祖父為父親的養父】因戶籍與戶長變更問題爭吵, 最後毫無結果的不歡而散。隔天父親便追隨先行離去的祖母返回山中之家。到了山中之家後, 父親與同母異父的弟弟吾一與祖母再嫁的繼祖父相處得很愉快。之後勢子帶著吾一四歲的女兒在下坡途中來到一家石材店, 遇見兩位二十歲左右的男子與他們的母親, 在一陣攀談後返回山中之家。父親最後決定帶著勢子返回台灣, 搭乘二十五號的船, 並趕在台灣神社祭以前在基隆上岸。

²²⁴ 「はげしい闘志を内に藏し」。

²²⁵ 「全く、もくもくと地道を歩いて来た」。

²²⁶ 「轉々する中に雄圖も中ば挫折した儘、官界の裳裾にやっとすがりつい」。

²²⁷ 「離れられない公務にあつたと云ふよりも、其れ丈の經濟的餘裕が無かつたのだ」。

²²⁸ 「歸つても知つてる者は居ない」。

²²⁹ 「台灣に骨を埋める覺悟だと頑固だった」。

²³⁰ 「永らく忘却の淵に蹲つていた故郷を、老母を求める激しい意欲が首を擡げたのに違ひない」。

²³¹ 「父が生家を持たず、母の即ち妻の生家に育ち」。

²³² 「父の祖父が歿つたといふ電報を受けた時、飛んで歸つて以來」。

筆者認為在小說〈故鄉寒冷〉裡，女主角勢子在父母故鄉（宗主國內地）與自己出生故鄉（台灣）兩者間，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定位。宗主國內地的故鄉，對於返鄉前的勢子而言，只不過是戶籍所在之地。可以說父親給了勢子兩個「故鄉」：出生成長的「殖民地台灣」與父母出生的「宗主國內地」。而隨著勢子返鄉後，「故鄉」的涵義也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一開始在母親的娘家中，勢子首次見到祖母。當勢子發現祖母隱約地看著她時，竟然「慌張地趕緊雙手貼地，以完全像客人般客氣地說道：『我是勢子，初次見面』」（〈ふるさと寒く〉，頁 38）²³³。看到祖母的反應是「以害怕似的眼神畏縮著，甚麼也沒說」²³⁴，勢子感到自己好像「做了非常不好的事似的低下頭」²³⁵。當勢子後來忽然因不停咳嗽而痛苦地低下頭時，「老母親初次顯出奶奶似的親情，戰戰兢兢地從布製提囊中取出大顆的水梨，勸著她：『吃吧！』」（〈ふるさと寒く〉，頁 39）²³⁶。然而，勢子卻是睜大眼睛，驚恐地看著祖母「用那乾透、青筋暴露、黝黑如同八角金盤似的手掌」²³⁷撫摸自己背脊，最後竟「全身因恐懼而顫抖著」²³⁸。祖母隨後將興趣轉往勢子的燙髮說道：「這是啥樣子呢？噢，都糾結在一起了呢」²³⁹，然後臉上浮現微弱的笑容。勢子和祖母並無感情基礎，對於祖母的關心，並「不明白那深處細節」²⁴⁰，只是「不忍地看著老母親近似卑屈的客氣的動作」²⁴¹。此後，她在母親娘家目睹父親的不自在與邊緣位置。父親「在母親家

²³³ 「慌てて手を付き、『勢子で御座います、始めまして』と全くの他人行儀で挨拶した」。

²³⁴ 「怯えた眼眸でたじろぎ乍ら何も云はなかった」。

²³⁵ 「非常に悪い事を犯した氣持で項垂れて仕舞った」。

²³⁶ 「始めて老母はおばあさんらしい愛情を見せ、それも恐る恐る信玄袋から大粒の梨を取り出し、『あがれや』と進め」。

²³⁷ 「眼を瞠って氣味悪がつた程、干涸びて筋張った黒い八つ手のやうな其の掌で」。

²³⁸ 「全身で怖氣震っていた」。

²³⁹ 「何ちふものぢやけ、え？纏れとるでえ」。

²⁴⁰ 「深いしさを知らなかったが」。

²⁴¹ 「この老母が卑屈な程、遠慮深く振舞ふのを、痛々しく眺めた」。

人的面前，態度始終不敢鬆懈，屢屢看著老母親，又把視線移開」²⁴²，動作始終保持拘謹且壓抑，「抱著胳膊，不敢見人似的低下頭，似乎一動也不動地壓抑著全身的激情」(〈ふるさと寒く〉，頁38)²⁴³。而當父親以「長期旅居在外，例如碰到小孩入學考試需要索取戶籍謄本の場合，如果不是戶長就非常的麻煩」(〈ふるさと寒く〉，頁42)²⁴⁴為由，向外祖父徵求擔任戶長或分家的同意時，外祖父卻認為父親只是想要爭奪財產的分配，於是透過各種理由，拒絕父親請求。父親進一步要求外祖父請阿嘉(よし)【筆者註：父親在母親娘家的義弟】在「明後天的祭典就算不願意還是得來」²⁴⁵，「要仔細弄清並端正是非對錯，矯正他彘扭的劣性」²⁴⁶。後來從父親在「這件事發生的隔天」²⁴⁷，帶著勢子前往山中之家可以得知，外祖父最後仍舊沒有採納父親的提議。當舅媽智慧得知勢子將跟隨父親去山中之家時，暗地裡向勢子數落山中之家，希望勢子能夠早點回來。勢子向智慧說道「可是畢竟是父親的家呢」(〈ふるさと寒く〉，頁41)²⁴⁸，智慧卻回答「嗯，不過你父親是一直在這家長大成人的」²⁴⁹。勢子的反應是：

透過父母之心見到的故鄉，被包覆在豐滿無盡的哀愁裡，舀取生命的無盡之流，佈滿綿綿不絕的山村芳香。無論何處都充滿勢子無法消化的老舊物。她不僅感受到村人們具有的濃密情感，同時對事物的視野狹隘，也讓她覺得很拘束。雖然對這故鄉有難以形容的摯愛，但若父母要求定

²⁴² 「母方の家族手前、態度も崩さず、老母を屢々見詰めては視線を逸らせた」。

²⁴³ 「腕を組み、面目無ささうに頭を垂れ、全身の激情に凝と耐へる様子であった」。

²⁴⁴ 「遠い旅に出ていると、例へば子供の入學試験等で戸籍謄本を取寄せた場合、わたしが戸主でないとな非常に面倒で」。

²⁴⁵ 「明後天の祭の日には嫌でも來るでせうから」。

²⁴⁶ 「理非を正して云ひ含め、あの僻み根性を是正してやる」。

²⁴⁷ 「こんなことがあつた次の日だつた」。

²⁴⁸ 「でもお父さんの家でせう」。

²⁴⁹ 「ううん、お父さん、ずっと此の家で大きくなんなさつたの」。

居下來的話，一定堅定地拒絕。【底線筆者強調】²⁵⁰

此時她覺得「抱著憧憬而來的內地故鄉的幻影，如今在心中搖擺不定」²⁵¹。內地親人思想上的狹隘及農村呈現的陳舊感都使她感到厭倦。在離開台灣返回母國後，勢子已開始產生對台灣的「鄉愁」。

來到山中之家的勢子，「因為無論何時三餐淨是相同的食物，於是完全失去食慾」(くふるさと寒く)，頁 43)²⁵²。勢子發現，相較於母親的娘家，父親在這找到了歸屬感。父親會把祖母再嫁的丈夫「有時會錯誤地叫成『父親』」²⁵³，並且「很快地與同母異父的弟弟吾一及其年輕的妻子融洽地談話，在簡陋的房子中非常自在且開心地過著」²⁵⁴。當她對父親說道：「想要早點回去」後，父親露出黯淡且寂寞的表情。她於是「竭盡全力地想要消除心中無盡的憂愁」²⁵⁵，帶著吾一四歲的女兒走下山坡，在石材店的庭院前與一位婦人談話。當勢子透過婦人之口得知，祖母生下父親不久丈夫就去世，於是將父親寄養在母親的娘家，自己再嫁到山中來。並常說不知道何時，等乳房漲了之後，想下山看看父親。勢子聽完後，心裡產生疑問：「故鄉—那麼，我的故鄉在哪呢？」²⁵⁶，並且

²⁵⁰ 「ちちはははの心を通してのふるさと、ふくよかな哀愁に包まれ、盡きぬながれの生命を掬み、綿々と續く山里のほひ。勢子にはかみきれない物事のふるさと何處のものさばって居た。村人達の持つ愛情の濃やかさと共に、ものを見る視野の狭さが彼女には窮屈なものに思はれた。堪らない愛着を此の故里の山河に感じ取る氣持はあつても、さて、父母が住みつくると手を差伸べるならば、勢子はいやいやと激しく拒絶するに相違なかつた」。

²⁵¹ 「あこがれを抱いて來た内地の故郷の幻像が、いま、ぐらぐらと、揺れ始めるのを感じていた」。

²⁵² 「三度の食事が何時も同じものばかりなので、すっかり食慾を失ひ」。

²⁵³ 「時々『お父さん』とまちがへて呼びかけるのであつた」。

²⁵⁴ 「同じ人を母に持つ弟の吾一や、その若い妻などと、直ぐ打とけて語らひ、むさ苦しい家で非常に伸々と楽しく過して居た」。

²⁵⁵ 「心の中の極りの無い呆とした憂愁を力任せにむしり取りたい氣持であつた」。

²⁵⁶ 「ふるさと。—さて私のふるさとは何処かしら」。

「在混濁且焦慮的意識中，想到父母，懷念地想像起南國燦爛的陽光」²⁵⁷。——
一直以來，她真正認知的「故鄉」是自己的出生地台灣。但當她發現宗主國內地
這個原本只是戶籍地的「故鄉」，卻因父親的連結開始產生實質的意義時，頓時
「心情受到打擊似的感到黯淡」²⁵⁸。

再度返回山中之家的勢子，開心地拿從台北隔一天寄來的報紙，交給父親
貪婪地閱讀時，勢子說：「還是台灣的報紙有趣，可以充分瞭解，太好了」。²⁵⁹
關於報紙，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指出報紙會藉由印刷資本主義使人類理
解世界的方式發生根本改變，會創造一種「共時性」。²⁶⁰而殖民地的報紙更具有
明顯的「地方性」，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會被折射到方言讀者群的特定
想像中。²⁶¹身處殖民地台灣的在台日人透過閱讀相同的報紙會產生對「台灣這
個區域」類似的集體認同。後來當父親說道：「我們回去吧……內地轉冷了，再
說那裡甚麼都豐富……我也覺得台灣好……」（〈ふるさと寒く〉，頁44）²⁶²時，
勢子驚訝地看著父親。因為她知道面對「捨去出生的故鄉，再度返回台灣的父
親」²⁶³，「絕對不是可以用簡單的感情所能下結論的」²⁶⁴。她理解父親在出生地
與成長地取捨的無奈，並更加尊敬父親身上「那深遠且宿命性的感慨」²⁶⁵。

此外，除了勢子「故鄉意識」的問題之外，作者龜田惠美子在小說〈故鄉
寒冷〉透過女主角勢子更凸顯出殖民地台灣出身的「灣生」在「宗主國」是有

²⁵⁷ 「混濁した焦慮の意識の中に、父母を思ひ、南國の溢れる陽を懐しく思ひ描いた」。

²⁵⁸ 「打のめされて真暗な氣持に蔽はれた」。

²⁵⁹ 「やっぱり、台灣の新聞が面白くて、よく分って、いいわね」。

²⁶⁰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頁69。

²⁶¹ 同前註，頁106。

²⁶² 「かへらうか……内地もさむなつて來たし、だいいち、あつちの方が何でも豊富だし、……お父さんも台灣がいい……」。

²⁶³ 「生れ故郷を捨てて、再び台灣へ歸らうと云った父」。

²⁶⁴ 「生易しい感情では割切ることの出来ない」。

²⁶⁵ 「奥深い宿命的な感慨」。

自覺到自己作為「他者」的存在。整篇小說裡，勢子都是刻意使用非常標準的「東京腔」。從勢子初次見到祖母時「以完全像客人般客氣地說道：『我是勢子，初次見面』」（〈ふるさと寒く〉，頁 38）²⁶⁶，與其他親人濃厚的方言成為強烈的對比。小說後半段，勢子與阿道（ミチ）下坡拜訪一位婦人時，旁邊兩位二十歲左右的男子正雕刻著墓誌銘。而當勢子無意識間「忘我地滔滔不絕說著台灣的悠閒、美麗、舒暢」²⁶⁷的同時，「雕墓中的兄弟倆歇了手，並定定地凝視著她」（〈ふるさと寒く〉，頁 43）²⁶⁸。這兩位男子之所以「定定地凝視著」勢子，或許是在思考為何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勢子是說標準的「東京腔」。而意識到這件事的勢子，「回過神發現並驚嚇於自己明顯的失態後，想到自己身在何處，現在到底在做甚麼的時候，悲愁立即從心底深處湧上」（〈ふるさと寒く〉，頁 44）²⁶⁹。

第三節 「台灣」記憶的重構：《旅の朝》²⁷⁰的台灣書寫

《旅の朝》為戰後龜田惠美子以「黒羽恵美子」為名出版的散文集，裡頭收錄許多關於過去台灣經驗的書寫。記憶不是重建，而是重構，戰後經驗和思維會影響戰前記憶的重構。²⁷¹由於戰後政治情勢的變化，原本母國日本和殖民地台灣的「日台」關係，轉變為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兩國的「日華」關係，這

²⁶⁶ 「慌てて手を付き、『勢子で御座います、始めまして』と全くの他人行儀で挨拶した」。

²⁶⁷ 「夢中で、台湾の長閑かさ、美しさ、氣樂さを喋舌り立てた」。

²⁶⁸ 「墓彫りの兄弟は手を休めて、まじまじと彼女を見詰めた」。

²⁶⁹ 「明らかに度を失っている自身を見出してぎくつとし、ここはどこだろう、自分はいま、何をしているのだと考へて行く中に、次第に悲しみが胸の底からせぐり上げて來るのを感じた」。

²⁷⁰ 黒羽恵美子，《旅の朝》（東京：日本隨筆家協會，1986年）。

²⁷¹ 洪郁如，〈灣生記憶如何閱讀：我們準備好了嗎？〉，《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市：蔚藍文化，2014年）。頁 18。

些被遣返回日的「灣生」認知到「故鄉」台灣已不能再被看作是昔日帝國的殖民地。戰後的龜田惠美子再次書寫那次返鄉之旅，以〈山の匂い〉一文收錄於《旅の朝》。戰後的某一時期，相隔五年時間，她再次返回父親墓前，想起自己年輕時曾與父親、祖母在 1940 年秋天一同到此祭拜先祖的畫面。她回憶當時祖母曾勸父親留下來，卻被父親拒絕。父親安慰祖母說道：「請多保重！因為我明年一定還會再回來的……」（《旅の朝》，頁 130）²⁷²，不幸的是父親隔年卻因船難身亡。後來日軍戰敗隔年，她與母親帶著分別放入亡父少數遺骨的小盒子與帆布包一起「被遣返回故鄉【底線筆者強調】」²⁷³，而在那「迎接的祖母是多麼地悲嘆阿」²⁷⁴。透過比對〈故鄉寒冷〉後發現，她的「台灣鄉愁」此時已不再明顯地呈現，而是將重心放在父親與祖母間的親情。她此時稱本州廣島為「故鄉」，故地重遊，心境卻發生變化。〈故鄉寒冷〉的勢子當時看到此處「集合各家族的墳墓，在豪華的墳墓間，夾雜沒有墓標的墳墓與僅僅由石塊堆成的土墳」（〈ふるさと寒く〉，頁 40）²⁷⁵，且因為「走起路來，有時會踐踏這些墳墓」²⁷⁶，所以心情「絕對不會感到愉快」。²⁷⁷但到了〈山の匂い〉，她回到「松林的景色與那時一樣」（《旅の朝》，頁 130）²⁷⁸的墓前，懷著思念父親的情緒，卻注意到先前未察覺的「山所發散的潮濕氣味」²⁷⁹，並「對那個芳香感到吃驚」²⁸⁰。

在龜田惠美子的心裡，戰前的台灣經驗就有如大樹的「根」，之後所開的枝葉則不斷吸取根的養分。從小生活在亞熱帶台灣的土地，對於氣候風土是再熟

²⁷² 「達者でいて下さい。また、来年かならず泊まりにきますから……」。

²⁷³ 「故郷へ引き揚げてきた」。

²⁷⁴ 「それを迎えたおばあさんの嘆きはいかばかりだったろう」。

²⁷⁵ 「各家の墓所が固まり合ひ、豪華な墓の間には、墓標も無い土饅頭や石塊をわづかに載せた墓もあり」。

²⁷⁶ 「歩き出すと、踏みつけたりして」。

²⁷⁷ 「決して氣持の好いものではなかった」。

²⁷⁸ 「松林の景色はあのこと変わらない」。

²⁷⁹ 「山は発散するしめった匂いに気がついた」。

²⁸⁰ 「その芳香におどろいた」。

悉不過，身體的感覺也會促使她產生「台灣」的想像。例如她曾在〈ルームメイト〉(〈室友〉)一文提及自己「因為是在南國長大成人，怕冷的人」(《旅の朝》，頁179)²⁸¹，所以至加拿大旅遊明明是七月仍然會以過冬的準備方式，帶著一次性暖暖包前行。被遣返回國後在東京看到冬天枯木林立的樣子，她在〈冬木立〉一文提到「在亞熱帶外地成長的我，直到返回日本前，從未見過落葉的樹木」(《旅の朝》，頁142)²⁸²。來到東京的第一個冬天，她坦言自己當時見到因寒冷導致樹葉全部掉落，僅剩光禿禿的樹幹時，曾在心中「以為這些樹在每年冬天都會枯死嗎」²⁸³而感到非常的驚訝。不過，她也說道「在熱帶地方，一切萬物都是華美且朝氣蓬勃的。但是，我也喜歡日本冬天枯木林立的樣子」(《旅の朝》，頁143)²⁸⁴。

然而，這種只有實際在台灣生活過才會有的獨特經驗，會在看到某樣東西時無意間冒出，甚至到了中晚年後仍可清晰記得。例如〈旅のよろこび〉(〈旅行的喜悅〉)一文提及自己有次前往西班牙的城市托雷多旅遊時感受到旅行的喜悅，因為「在西班牙見到了自己的故鄉【底線筆者強調】」(《旅の朝》，頁157)²⁸⁵，「好像重新返回我出生時候的淡水般」²⁸⁶。此時的她稱呼自己的出生地台灣淡水為「故鄉」，並仔細地回顧淡水的市貌：「面向流往海的淡水河口，背後是略微高起的山丘」²⁸⁷，「爬上並走過開滿扶桑花的坡道後，在森林之中，有一座很高的閣樓被稱為聖多明哥城」²⁸⁸。此外，〈ユリの花と水牛と〉(〈麝香百

²⁸¹ 「私は南国育ちの寒がりので」。

²⁸² 「亜熱帯の外地で育った私は、日本へ帰るまで、落葉する木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

²⁸³ 「私はそれらが冬ごとに枯死してしまうのかしらとびつくりした」。

²⁸⁴ 「熱帯地方では、万物すべて華やかで、おしゃべりで、躍動的である。しかし、私は日本の冬木立もまた好きである」。

²⁸⁵ 「スペインにふるさとを見た」。

²⁸⁶ 「台湾の淡水の町へ舞い戻った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った」。

²⁸⁷ 「海へそそぐ淡水河の河口に面して、背後は小高い丘になっていた」。

²⁸⁸ 「ハイビスカスが生い茂る石畳の坂をのぼって行くと、森の中に、セント・ドミンゴ城と呼ばれる高い塔屋があった」。

合與水牛)一文提及每當她看見麝香百合時，必定會聯想到懷念的分教場生活與當時和よねちゃん間的友情，以及初次親眼見到水牛的震撼感。當時她在台灣偏鄉【筆者註：羅東】的分教場就讀，下課後受三年級女同學よねちゃん邀請前往其家附近的小河玩水。而她在遊玩時，突然遇見「一群至今被山崖遮住而看不見的水牛正在泡水」(《旅の朝》，頁33)²⁸⁹。她當時覺得害怕，然後「一邊焦急地往岸邊向後退，一邊眼睛盯著水牛」(《旅の朝》，頁34)²⁹⁰。她非常仔細地描述當時水牛的樣子：「全黑的身體沉入水中，下顎則浮出水面」²⁹¹，「美麗半月形的大角」²⁹²，「褐色且濃密的短毛中，見到如放入紫色葡萄顆粒般的圓眼睛」²⁹³。當她返回よねちゃん家時，よねちゃん則「出其不意地出現在面前，手上抱著大把的麝香百合」(《旅の朝》，頁33)(《旅の朝》，頁33)²⁹⁴。此後，「大束且被紙包覆的百合出乎意料地，轉眼之間」(《旅の朝》，頁35)²⁹⁵被遞到龜田惠美子手上。最後她將花「抱在懷中，看不見自己的腳底，好像快滑落的樣子，默默地走過山道回家」²⁹⁶。

龜田惠美子戰後曾數次重返台灣。若觀察她返台的足跡後，可以看出明顯的「尋根」跡象。例如，龜田惠美子曾重返昔日就讀的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中)旁的新公園。她遇見公園裡有打著太極拳的大人們，還有在樹蔭下擺弄著大刀在運動的青年。她看著這些人的動作，「不由得模仿起來，心情感到相當愉快」(《旅の朝》，頁16)²⁹⁷然而，在這「尋根」的過程，比起「鄉

²⁸⁹ 「今まで崖にかくれて見えなかった水牛たちが水浴していたのだった」。

²⁹⁰ 「じりじりと岸辺へ後ずさりしながら、水牛から目を離さないようにした」。

²⁹¹ 「彼らもまたとつぷりと体を沈め、水面にアゴを浮かせていた」。

²⁹² 「太い角が見事な半円を描いている」。

²⁹³ 「褐色の密生した短毛の中に、紫のぶどうの粒をはめこんだような丸い目」。

²⁹⁴ 「よねちゃんが不意に姿を現した。テッポウユリの大束を抱えて」。

²⁹⁵ 「ユリの大束を紙にくるむということも思いつかなかつたらしく、どさつと」。

²⁹⁶ 「私も抱きかかえて、足もとがよく見えないまま、ずり落ちそうになるのに閉口しながら、山道を帰った」。

²⁹⁷ 「思わず彼らのまねをしていた。気持ちがよかつた」。

愁」，她感受更多的是「疏離感」。她在 1983 年的返台之旅，曾回到基隆參加母校的同學會。當她搭乘巴士經過八堵前往基隆時，天空下起大雨。此時的她想起自己少女時代在基隆度過六年的歲月，那時也「經常整天下著雨」（《旅の朝》，頁 28）²⁹⁸。下車後她走過「與昔日相同的街道」²⁹⁹來到了母校。雖然事隔多年，但對街道與氣候的熟悉感仍深刻地烙印在腦中。同學會後，她原本打算到以前的住家看看，於是一個人走在大街上。可是，她卻發現一旁的車子疾駛而過，並沒有禮讓行人的打算，「以日本人來說那感覺非常可怕，因此無法穿過馬路」（《旅の朝》，頁 30）³⁰⁰。離開台灣多年，她作為一個「日本」國民重新回到不同國家的「台灣」時，開始感受到世態變化之大。伴隨強襲的大雨與被車子濺起的泥濘，最後她放棄回老家的念頭。她突然對基隆感到疏離，並感嘆：「基隆阿，怎麼你變得如此粗暴呢？」³⁰¹，「焦躁不安地」³⁰²回基隆港。

龜田惠美子在書寫台灣記憶時，理性地看待台灣過去被殖民的經驗，正面地描寫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受到的壓抑。經歷戰後和平的時代，她在〈母国語〉（〈母國語〉）一文提到「像身體一部份般的母語變得不能使用，是不能想像的事情吧」（《旅の朝》，頁 133）³⁰³。她回憶當時在皇民化國語政策施行的台灣擔任南港公學校教師的經驗。年僅七歲的少女陳氏敏，趁其他同學在黑板上作答的期間，突然用台語大叫了甚麼，引起全班學生大笑。當時的她並不了解這位學生說了甚麼，只「感覺自己一個人被疏遠而著急」（《旅の朝》，頁 134）³⁰⁴。後來學生焦急地解釋：「我只是說『那個答案，是錯的』，還沒想到日語怎

²⁹⁸ 「明けても暮れても、雨である」。

²⁹⁹ 「昔のままの街路を通り、女学校に到着した」。

³⁰⁰ 「日本人の感覚ではとても恐ろしく横断できない」。

³⁰¹ 「基隆よ、どうしておまえはこんなに荒荒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

³⁰² 「苛立たしい思いで」。

³⁰³ 「体の一部のような母国語が使えなくなるなんて、想像もできないことだろう」。

³⁰⁴ 「私は、自分ひとり疎外された感じ、苛立った」。

麼說的時候，就講了台語」³⁰⁵，並「激動地把桌上的鉛筆盒與筆記扔在地板上，大聲痛哭」³⁰⁶。此時的她感到痛心，產生疑問：「為何在家可以自由地使用台語，而在學校卻禁止使用呢？」³⁰⁷，之後說道：「我也因為和幼小的她們【筆者註：指學生】一樣在相同的土地上出生與成長，所以相當理解她的悲痛。只不過，我是日本人」（《旅の朝》，頁 135）³⁰⁸。根據以上內容可看出，龜田惠美子看到皇民化運動下本島人小孩的困境時，內心感到相當矛盾，既同情卻又無可奈何。她作為在台灣出生成長的「灣生」，雖然深知本島人和自己在文化與種族上明顯的差異，但因同時擁有「日本人（內地人）」的身分，所以仍必須做出有益於日本帝國的選擇。不過，當戰爭結束時，她仰頭看著「大街上升起的大招牌寫著『祝大戦勝』『還我山河』」³⁰⁹時，心中竟產生「複雜的感動，連同周圍的場景，就算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³¹⁰。作為日本人的龜田惠美子在日軍戰敗時，面對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的情況竟然會覺得「感動」？這個「感動」從何而來？雖然龜田惠美子書寫〈母国語〉時已到戰後，但若回顧戰前，龜田惠美子曾於 1940 年「皇民化運動」盛行時辭去公學校教師。黑羽夏彥指出，龜田惠美子覺得自己不適合擔任教職員工作，其後換了幾份工作。³¹¹這似乎亦表現龜田惠美子作為「灣生」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對於內心矛盾的解決之道。

³⁰⁵ 「わたし、『あの答、ちがう』と言っただけ。知らないうちに、台湾語が出たの」。

³⁰⁶ 「机の上の筆箱やノートを激しく床へ投げつけて、大声で泣きだした」。

³⁰⁷ 「家で自由に使っている台湾語を、なぜ、学校で使っていないの？」。

³⁰⁸ 「私も幼い彼女たちと同じ土地に生まれ育ったので、彼女の悲痛さがよく分かった。ただ、私が日本人だっただけである」。

³⁰⁹ 「大通りに掲げられた大アーチには、『祝大戦勝』『山河我に還る』という太文字が躍っていた」。

³¹⁰ 「それを見上げたときの私の胸の複雑な感動を、あたりの情景と共に、今でもあざやかにおぼえている」。

³¹¹ 黒羽夏彦，〈「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二）〉，（來源：<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441.html>，2021 年 5 月 4 日）

小結

綜觀「灣生」作家龜田惠美子從戰前的〈くふるさと寒く〉(〈故鄉寒冷〉)至戰後的《旅の朝》(《旅之朝》)可以發現，「故鄉」的涵義發生微妙的變化。戰前的她在作品中明顯帶有濃厚的台灣鄉愁，且一直在父母故鄉(宗主國內地)與自己出生故鄉(殖民地台灣)兩者間，努力找尋平衡點。「宗主國內地」的故鄉，對於返鄉前的勢子而言，只不過是戶籍之地。抵達宗主國後的勢子，由於自己對祖母的疏離、父親在成長家中的邊緣地位、內地親人思想上的狹隘，及農村呈現的陳舊感，都促使勢子產生對於「台灣」的「鄉愁」。然而，當勢子返回父親的山中之家時，頓時對於自己的「故鄉」感到迷茫。原因在於她看見父親在生家找到歸屬感及意識到祖母對父親深厚的感情。原本只是作為戶籍地的「宗主國內地」，卻因父親的連結開始產生實質的意義。而若進一步觀察整篇小說，會發現勢子都是刻意用非常標準的「東京腔」。這似乎凸顯勢子作為「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或許是出於這個「不安」，勢子最終透過自己的身體經驗選擇「南國的陽光」。到了戰後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動，原本母國日本和殖民地台灣的「日台」關係，轉變為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兩國的「日華」關係。對於被遣返回國的她而言，「故鄉」台灣已不能再被看作是昔日帝國的殖民地。相較於戰前的小說〈くふるさと寒く〉，戰後龜田惠美子在《旅の朝》裡流露的「鄉愁」已淡化許多。例如〈山の匂い〉，台灣的「鄉愁」已不再明顯呈現，而是將書寫的重心放在父親與祖母的親情。不僅如此，戰後的她作為「日本」國民重新回到不同國家的「台灣」時，比起「鄉愁」，感受更多的或許是「疏離感」。若觀察她返台的足跡，可以發現有明顯的「尋根」傾向，包括過去就讀的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中)旁的新公園，還有基隆老家。在這個「尋根」的過程，「疏離感」與「鄉愁」反覆在龜田惠美子的書寫裡交織出現。而除了「鄉愁」之外，從戰後的《旅の朝》，亦可

以發現龜田惠美子對於「殖民台灣史」的重新回顧亦呈現不同於「母國日本人」的「灣生」視點。她在回憶過去的台灣經驗時，不只是以理性的眼光審視過去的「殖民者」經驗，亦兼顧對於「本島人」被殖民經驗的理解與尊重。她的台灣認同，來自從小出生並成長的鄉土與自己的身體經驗。台灣作為她的「根」，在描寫台灣的同時，亦是形塑自己的「灣生認同」。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首先藉由擴大「灣生」的定義及釐清「灣生認同」的定位，在探討「灣生書寫」時得以涵蓋更多與「殖民地台灣」緊密連結的日人作家。「灣生」作為「日本人」、「殖民者」，之所以從「母國日本人」被差異化，與「殖民地台灣」深厚的連結有關。當時的「殖民地台灣」，不管是對於「母國日本人」而言，或是在整個日本帝國的構圖，皆屬於「特殊」的存在。「殖民地台灣」不論是在「國家統合」的層面，或在風土、民情的層面，與「宗主國」相比皆存在差異。儘管「殖民地台灣」與「宗主國」存在這些差異，但對於「灣生」而言，「殖民地台灣」卻又同時承載其對於家人／殖民地文化／土地的連結。故「灣生認同」是「灣生」這個文化主體作為「日本人」與帶著帝國「他者」異質成分的「殖民地台灣」出身的交互作用下漸漸形成。可以說「灣生」是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說的「中介者」（in-between）的存在，其文化主體具有超越內地／本島二元對立圖式的「混雜性」（hybridity）。故本論文透過對三位作家：真杉靜枝（1901-1955）、中山侑（1909-1959）、龜田惠美子（1921-2014）「灣生書寫」的探討，藉以瞭解「灣生」試圖在「殖民地台灣」建立「歸屬感」的過程中呈現的「不安」與「流離」（Diaspora）的情感。

第二章以真杉靜枝戰爭時期書寫的兩篇小說〈雛雞〉（1938年）與〈烏秋〉（1941年），及隨筆集《無謂的振翅》（1940年）的部分書寫為例，提出真杉靜枝在作品含有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這個「中介者」視點的產生，與真杉靜枝長期活躍於「宗主國」文壇和從小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經歷有關。她在書寫過程強烈意識到「宗主國」讀者的視線，對自己的殖民地出身深感「不安」。本章透過對小說〈雛雞〉與〈烏秋〉，及隨筆集《無謂的振翅》裡「中介者」視點的觀察，提出兩個重要面向：「灣生」身處「宗主國」的「不安」與「流離」、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與矛盾。小說〈雛

雞》，將「灣生」在「宗主國」的「不安」透過縞代的觀察呈現。這個「不安」不僅是伴隨著「殖民地台灣」特殊記號：「南方殖民地」、「暗黃色皮膚」而來的歧視目光，還有對於「宗主國」的疏離感。小說〈烏秋〉透過女主人公八重的觀察呈現「皇民化運動」在「殖民地台灣」的情況。雖然八重與照枝在面對「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時的態度形成對比，但照枝對於「在地性」的樂觀態度給予八重面對自己殖民地出身的勇氣。相比真杉靜枝在返台前書寫的〈雛雞〉，女主人公縞代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是介於「灣生」(外甥)與「母國日本人」之間，返台後書寫的〈烏秋〉裡女主人公八重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是介於「準灣生」(妹妹照枝)與「母國日本人」之間。前後呈現的「中介者」(in-between)視點在意涵上稍有差異。而就真杉靜枝個人而言，本章藉由隨筆集《甲斐なき羽撃き》(《無謂的振翅》)(1940年)裡〈南方の雨〉(〈南方之雨〉)真杉靜枝對「殖民地台灣」的神社敬拜一事，不僅得以觀察到其作為「中介者」(in-between)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思考，還有面對「殖民地出身」的矛盾與認同。透過觀察上述真杉靜枝兩篇小說與隨筆集的內容，可以發現儘管其意識到「殖民地出身」恐怕會使自己在「宗主國」被當作「他者」的存在，但透過與家人在情感的連結，亦使其逐漸消除面對「殖民地出身」的「不安」。

第三章試圖以線性發展的軌跡捕捉中山侑在「殖民地台灣」的成長，探討中山侑的「灣生」身分如何促成日後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及對於「本島人」作家的理解。中山侑從1930年代「新劇運動」到1940年代「皇民化運動」，始終關心「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的建設。然而，他作為「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內地人」，不論身處「異民族」居多的「蕃地」，或身處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宗主國」，都存在作為「外來者」的「不安」。本章透過對中山侑的小說〈抗議〉(1941年)與劇本〈客廳〉(1942年)的觀察，提出三個重要面向：「灣生」身處「殖民地台灣」的「不安」、對於「日本帝國」下「台

灣」文化的想像及作為「日本帝國」下「台灣人」的展望。不論是〈抗議〉或〈客廳〉，皆呈現中山侑面對「異民族」的「不安」。然而，中山侑透過對於「近代性」與「殖民地台灣」「在地性」的追求，逐漸與本島人知識份子建立起「文化認同」上的連結，達到「跨越民族」的可能。而中山侑在本島人知識份子的引導下，亦得以逐漸消除自己在「殖民地台灣」作為「外來者」的「不安」，完成在地化的過程。

第四章透過對龜田惠美子戰前與戰後的作品：小說〈故鄉寒冷〉（1941年）與散文集《旅之朝》（1986年）的觀察，提出三個重要面向：戰前至戰後「灣生」「鄉愁」涵義的轉變、戰前離台與戰後返台的「不安」、戰後「殖民地」記憶的重構。雖然相較於戰前的小說〈故鄉寒冷〉，戰後的散文集《旅之朝》流露的台灣「鄉愁」已淡化許多，但是從龜田惠美子戰後的返台足跡來看，依舊可以發現明顯的「尋根」傾向。她追尋著過去生活過的痕跡，在「尋根」的過程，「鄉愁」與「疏離感」同時在書寫裡呈現。儘管戰後時空背景已發生重大改變，但是她作為「殖民地台灣」出生成長的「灣生」，「殖民地台灣」的氣候與鄉土經驗已深深烙印於體內。她在回憶「心之故鄉」的同時，亦是在建立自己的「灣生認同」。

綜合以上對於三位作家及書寫的探討，不僅可以瞭解「灣生」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是建立在「家人」、「殖民地文化」與「土地」上，在認同的過程亦是經歷不斷的協商。透過分析這三位作家及書寫，可以發現彼此在「灣生書寫」系譜的建立與「灣生認同」的程度具有對話的空間。由於三位作家所處的時空環境皆不完全相同，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亦奠基在不同的人、事、物上。故在各自的「灣生書寫」對於「家人」、「殖民地文化」與「土地」的描寫與側重皆有不同，呈現出不同的面向。

首先，第一位作家真杉靜枝同時具有成長於「殖民地台灣」與長期居住並活躍於「宗主國」的經驗。她作為1900年世代，成長的是1920年代前的「殖

民地台灣」。當時的「殖民地台灣」剛被日本統治不久，「近代化／日本化」的程度與其他兩位作家中山侑與龜田惠美子所處的時代相比有所落差。因此，她的「灣生書寫」對於「灣生」相對於「母國日本人」的「差異性」，及「殖民地台灣」相對於「宗主國」的「在地性」皆有深刻的描述，展現介於「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灣生」間的「中介者」(in-between) 視點。雖然她並未出生於「殖民地台灣」，但在面對廣大的「母國日本人」讀者群時，仍然強烈意識到自己的「殖民地出身」，並感到「不安」。然而，她與居住於「殖民地台灣」的「家人」與成長的「家」的深厚感情，也使她無法輕易地割捨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流離」情感主要奠基於「人」。因此，她的「灣生書寫」常圍繞在對於自己「家人」的觀察，透過書寫「家人」來建立自我認同。

接著，第二位作家中山侑的成長軌跡幾乎涵蓋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並且長期從事「殖民地台灣」的文化運動。他出生並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蕃地」，父親是「理蕃警察」。這樣的背景不僅使中山侑從小對於佔據「殖民地台灣」多數的「異民族」感到「不安」，對於「近代」亦感到嚮往。然而，中山侑一直到「新劇祭」的失敗前，不僅未想過要面對同處「殖民地台灣」的其他「異民族／異文化」，也未發現自己對於「殖民地台灣」的「在地性」的「無知」。他透過張維賢的民烽劇團在「新劇祭」的表演，不僅意識到自己作為「內地人」在「殖民地台灣」的極限，也意識到「文化轉譯」的重要性。儘管在他的「灣生書寫」裡，雖然仍呈現其從事文化運動時對於「異民族」的「不安」，但亦觀察到其透過與本島人知識分子建立「文化認同」的連結，逐漸消除「不安」。他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流離」情感主要奠基於「人」與「殖民地文化」。因此，他的「灣生書寫」常圍繞在對於本島人知識分子及殖民地台灣「在地性」的觀察與思考。這個「在地性」不僅是「日本帝國」下「台灣」文化，還包括「台灣人」的思考。然而，隨著戰後台灣政權的更替，「人」與「文化」

的轉變使中山侑對於「殖民地文化」的關注也被迫中斷。

最後，第三位作家龜田惠美子是出生最晚的一位。她不僅出生並成長於「殖民地台灣」，且足跡橫跨戰前至戰後。她作為 1920 世代，成長的「殖民地台灣」已歷經日本統治超過 30 餘年。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的「異民族／異文化」的「不安」不如真杉靜枝與中山侑強烈。雖然戰前的她具有返回「宗主國」父親的「故鄉」的經驗，但由於「疏離感」與對於「殖民地出身」的「不安」，在「宗主國」找不到認同的所在。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是奠基於身體的經驗，也就是對於氣候與風土的熟悉。到了戰後，隨著台灣政權的更替，儘管「殖民地台灣」已不能再看作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但台灣的氣候與風土並未完全改變。不僅是戰前台灣「熱帶」「多雨」的氣候，許多日治時期的建築被保留下來。被遣返回國後的龜田惠美子，身體感覺上仍殘留「殖民地台灣」的記憶。戰後再度重返台灣的她，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流離」情感仍然主要奠基於熟悉的氣候與風土。因此，她的「灣生書寫」著重於自己的身體感覺，透過描寫熟悉的氣候與風土來追尋過往的足跡。

本論文透過比較真杉靜枝、中山侑、龜田惠美子三位作家，整理出從戰前至戰後，從宗主國至殖民地，從 1900 出生的世代至 1920 出生的世代，試圖釐清「灣生書寫」的重層化面向。藉由此研究成果，呈現「灣生書寫」除了「鄉愁」與「土地認同」之外，還有其他值得探討的不同面向。而通過探討「灣生書寫」的問題，不僅瞭解到「灣生認同」並非僅用「殖民者認同」就可概括，還有「日本語」、「日本人」、「日本文學」的概念不應該只是停留於「宗主國的」這種單面思考。

由於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突顯戰前至戰後「灣生書寫」的重層化面向，替「灣生書寫」找到更明確的定位與歸宿。故在研究範圍選擇的作家及作品上，礙於篇幅及筆力未能進一步深化。例如真杉靜枝作品含有的「中介者」視點與其戰前至戰後作品經常出現的「混血兒」形象間的聯繫；中山侑「灣生認

同」在其他皇民化時期劇本的具體呈現，及其與西川滿的路線之爭問題；龜田惠美子刊載於《文藝台灣》雜誌以外的隨筆探討，這些仍有待之後的研究者補足。此外，本論文僅就真杉靜枝、中山侑、龜田惠美子三位作家的「灣生書寫」作為「灣生認同」差異的釐清，對於其他在台日人作家或是本島人作家的「灣生書寫」並未作進一步詳盡的比較，這些仍有待探索與挖掘的空間。而「灣生」作為「移民」，亦可以與其他世界移民文學，或全球後殖民論述作連結。例如在香港、新加坡出生的英國人作家，滿州出生的日本人作家，或 1949 年後來台的「外省」族群，其中又存在哪些共同經驗與問題，或許是今後可繼續延伸探討的課題。

時至今日，距離 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超過 70 餘年，「灣生」族群日漸凋零。近年來出現許多「灣生」於晚年撰寫的回憶錄，與諸多「灣生」結伴來台試圖追尋昔日足跡的消息。在看待這些的同時，若能進一步思考「灣生」背後曾遭遇的認同困境，及歷經過戰後被遣返回國的辛酸血淚，或許會更珍視其現今與「台灣」在情感上的連結。而承載於「灣生」身上厚重的歷史記憶，亦使身處現代的我們得以見證過去未曾經歷或是難以想像的面貌。

參考資料（按姓氏筆畫排列）

一、中日文文獻

（一）史料、文獻

- 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年1月）。
- 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社會事業の友》第86期，（1936年1月）。
- 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二）〉，《社會事業の友》第87期，（1936年2月）。
- 中山侑，〈南千住隣保館追想（四）〉，《社會事業の友》第91期，（1936年5月）。
- 中山侑，〈理蕃閑語〉，《理蕃の友》（1936年10月）。
- 中山侑，林信甫譯，〈日有所感—關於皇民化戲劇〉，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 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一）—藝術運動の再吟味〉，《臺灣時報》（1936年2月）。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三）—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年5月）。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四）—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年6月）。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五）—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臺灣時報》（1936年7月）。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六）—藝術運動の再吟味〉，《臺灣時報》（1936年9月）。
- 志馬陸平，〈青年と臺灣—文學運動の變遷〉，《臺灣時報》（1937年1月）。
- 志馬陸平，〈時局下台灣の娛樂界〉，《臺灣時報》（1940年1月15日）。
- 志馬陸平，〈討伐譚—父・戰慄を語る—第一話 月光に閃く短槍〉，《台灣警察時報》第284期，（1939年7月10日）。
- 志馬陸平，〈討伐譚—父・戰慄を語る—第二話 狙撃された憲兵〉，《台灣警察時報》第286期，（1939年9月10日）。
- 蓬頭兒，〈點心〉，《民俗台灣》3卷2號，（1943年2月5日）。

(二) 文本

中山侑，〈ある抗議〉，《台灣文學》1卷1號（1941.5）。

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1號（1942.2）。

中山侑，〈客間〉，《台灣文學》2卷2號（1942.3）。

中山侑，涂翠花譯，〈抗議〉，《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台北市：麥田出版，2010年）。

真杉靜枝，〈ひなどり〉，《ひなどり》（東京市：竹村書房，1939年）。

真杉靜枝，〈烏秋〉，《南方紀行》（東京：昭和書房，1941年）。

真杉靜枝，黃玉燕譯，〈烏秋〉，《文學台灣》96期（2015.10）。

真杉靜枝，《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市：協力出版社，1940年）。

黒羽恵美子，《旅の朝》（東京：日本隨筆家協會，1986年）。

龜田恵美子，〈ふるさと寒く〉，《文藝台灣》第2卷第4號（1941.7）。

龜田恵美子，葉石濤譯，〈故郷寒冷〉，《台灣文學集1—日文作品選集》（高雄市：春暉，1996年）。

二、選集、全集與復刻

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文學辭典》（新北市：聯經，2019年）。

真杉靜枝，原ひろ子監修，《女性のみた近代24：《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

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卷6〕（隨筆集（一））》（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

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卷7〕（隨筆集（二））》（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 第一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 第二冊》（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年）。

三、專書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一青妙著，張雅婷譯，《我的台南：一青妙的府城紀行》(台北市：聯經，2015年)。

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年)。

大東和重，《台南文学：日本統治期台湾・台南の日本人作家群像》(西宮：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5年)。

小熊英二，黃耀進、鄭天恩譯，《「日本人」的界線：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新北市：聯經，2020年)。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年)。

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年)。

竹中信子，熊凱弟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上)》(台北市：時報文化，2009年)。

竹中信子，熊凱弟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下)》(台北市：時報文化，2009年)。

竹中信子，蔡龍保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台北市：時報文化，2007年)。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市：聯經，2013年)。

吳豪人，《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新北市：衛城出版，2016年)。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市：遠流，1998年)。

阮斐娜，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市：麥田，2010年)。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市：聯經，2016年)。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2015年)。

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

星名宏修，《植民地を読む：「賈」日本人たちの肖像》(東京都：法政大学出版局，2016年)。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縣：稻鄉，2005年)。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荊子馨 (Leo T.S Ching)，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台北市：麥田，2006年)。

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日本」の歴史—地政的配置》(東京都：講談社，2015年)。

張素玢，《未竟的殖民：日本在台移民村》(新北市：衛城出版，2017年)。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

陳培豐，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

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台北市：玉山，2007年)。

新垣宏一，張良澤編譯，《華麗島歲月》(台北市：前衛，2002年)。

鈴木怜子，邱慎譯，《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市：蔚藍文化，2014)。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市：南天書局，2020年)。

駒込武，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台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

駒込武，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

四、單篇論文

David Arnold, 蔣竹山譯, 劉士永、傅大為校訂, 〈醫學與殖民主義〉, 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 《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 群學, 2004年)。

吳宗佑, 〈生活就是報國—中山侑的青年劇運動〉, 《往返之間: 戰前台灣與東亞文學・美術的傳播與流動》(台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017年)。

吳密察, 〈《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 《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 播種者出版, 2008年)。

吳佩珍, 〈血液的「曖昧線」—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3期(2011.10)。

吳佩珍,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6)。

吳佩珍, 〈真杉靜枝的「故鄉」/「異鄉」: 〈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中的「殖民地台灣」記號〉, 《台灣文學學報》22期(2013.6)。

吳佩珍, 〈日人作家的「文學史觀」疑義〉, 《聯合文學》328期(2012.2)。

吳佩珍, 〈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4)。

洪郁如, 〈灣生記憶如何閱讀: 我們準備好了嗎?〉, 《南風如歌: 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市: 蔚藍文化, 2014年)。

酒井直樹, 〈現代性與其批判: 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期, (1998.6)。

酒井直樹, 〈序論—ナショナリティと母(国)語の政治〉, 酒井直樹、巴里(バリー・ブレット・ド)、伊豫谷登士翁編, 《ナショナリティの脱構築》(東京都: 柏書房株式會社, 2003年)。

鍾淑敏, 〈導讀—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灣生回家》(台北市: 遠流出版, 2014年)。

垂水千惠, 〈台湾という身体の「再現」—真杉静枝を書くということ〉, 張季琳主編, 《日本文

- 学における台湾》(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年)。
- 星名宏修，〈植民地の「混血兒」：「内台結婚」の政治學〉，《台灣の「大東亞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12)。
- 中島利郎，〈中山侑という人〉，《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序說》(東京：綠蔭書房，2004年)。
- 中島利郎，許佳璇譯，〈西川滿與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臺灣時代〉，《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 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的戲劇論述－藝術理念和政策之間的協力關係及其糾葛〉，《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
- 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期(2010.9)。
- 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臺灣文壇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
- 柳書琴，〈導言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市：播種者出版，2008年)。
- 楊智景，〈解題〉，《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年)。
- 李文茹，〈植民地を語る苦痛と快樂－台湾と日本のはざまにおける真杉静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日本台湾学会報》5號(2003.5)。
- 李文茹，〈殖民地・戦争・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8.6)。
-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1期(2009.8)。
- 林慧君，〈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台灣文學學報》16期(2010.6)。
- 林初梅，〈比較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鄉土讀本－灣生學童的鄉土意識及台灣學童的日本認同〉，《台灣學通訊》93期(2016.5)。

林初梅，〈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鄉土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所澤潤、林初梅主編，《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台北市：允晨文化，2017年）。

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禊子的《鄭一家》及真杉靜枝的《南方紀行》《囑咐》中的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22期（2006.03）。

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7期，（2005.3）。

邱雅芳，〈殖民地新故鄉？真杉靜枝從〈南方之墓〉到〈南方的語言〉的台灣意象〉，《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台北市：聯經，2017年）。

邱坤良，〈戰時在台日本人戲劇家與台灣戲劇－以松居桃樓為例〉，《戲劇學刊》12期（2010.7）。

阮斐娜，陳美靜譯，〈性別與現代性：日本台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李奭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縣：稻鄉，2008年）。

五、網路資源與資料庫

中研院台史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官）報資料庫」。

《台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漢珍知識網（報紙篇）。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國立台灣圖書館。

Japan Knowledge+線上資料庫。

黒羽夏彦，〈「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一）〉，（來源：
<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377.html>，2021年5月4日）。

黒羽夏彦，〈「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二）〉，（來源：
<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441.html>，2021年5月4日）。

黒羽夏彦，〈「灣生」だった祖母について（三）〉，（來源：

<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72198580.html>，2021年5月4日）。

六、學位論文

石婉舜，〈一九四三年台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石婉舜，〈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

吳宗佑，〈「民眾」的戲劇實踐：以日治時期日台知識人的劇本創作為中心（1923-194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吳曉恬，〈殖民間隙裡的糾葛與記憶：以立石鐵臣的創作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6年）。

李文茹，〈帝国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年）。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蔡知臻，〈灣生的記憶與認同：以鈴木怜子及《南風如歌》為探討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18年）。

七、其他

黃銘正導演，陳宣儒監製，紀錄片《灣生回家》，2015年10月16日於台灣上映。

附錄 龜田惠美子／黑羽惠美子年表（1921-2014）

時間	生平	作品、評論
1921 年	◆ 龜田惠美子於台北淡水的官舍出生。父親龜田主一時任淡水郡役所庶務課雇員。	
1929 年 (8 歲)	◆ 父親被調職至羅東郡役所庶務課。龜田惠美子進入羅東附近的分教場。	◆ 兒時經驗於戰後寫至〈ユリの花と水牛と〉，《旅の朝》。
1932 年 (11 歲)	◆ 父親被調職至基隆郡役所庶務課。龜田惠美子進入基隆高等女學校。	
1938 年 (16 歲)	◆ 父親被調職至七星郡役所庶務課。龜田惠美子進入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39 年 (18 歲)	◆ 透過恩師濱田隼雄的介紹認識西川滿，後加入《文藝台灣》集團。 ◆ 畢業後取得「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的教師證書。	◆ 12 月，〈返信〉，《華麗島》創刊號。 ◆ 公學校的教職經驗於戰後寫至〈母国語〉，《旅の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任教於台北市南港公學校，擔任教員心得一職。 	
1940 年 (19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辭去公學校教師一職，適逢戰爭時期，男性出征，因人手不足，女性求職並不難，期間反覆換了幾份工作。 ◆ 秋天，利用父親一個月的休假期間，與其一同返回故鄉廣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此次返鄉經驗於戰後寫至〈山の匂い〉，《旅の朝》。
1941 年 (20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1 月 7 日，父親龜田圭一於新店溪發生的船難事件中溺水身亡。 ◆ 12 月 7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 月 20 日，〈ふるさと寒く〉，《文藝台灣》第 2 卷第 4 號。 ◆ 8 月 9 日，〈ある出來事 田舎のバス風景〉，《台灣日日新報》。 ◆ 9 月 20 日，〈街〉，《文藝台灣》第 2 卷第 6 號。 ◆ 9 月 27 日，〈風俗の反省〉《台灣日日新報》。

1942 年 (21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4 月，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書記身分前往香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 月 20 日，〈鼎談〉，《文藝台灣》第 4 卷第 3 號。同人針對小說〈ふるさと寒く〉做相關評論。
1943 年 (22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因日本在戰爭中逐漸喪失制海權，2 月，龜田惠美子從香港返台北。 	
1944 年 (23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雇員身分任職於總督官房情報課，進入《台灣時報》工作。 ◆ 與台北第二中學校教師黑羽義治結婚，改名為「黑羽惠美子」。 ◆ 黑羽義治不久受戰爭動員，期間台北屢次遭受空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5 月，〈思ひ出の街〉，《台灣公論》。 ◆ 6 月，〈九龍生活〉，《台灣時報》。
1945 年 (24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8 月，戰爭結束前一週，於台北的住宅受到空襲毀壞。 ◆ 8 月 15 日，日軍宣布投降。 ◆ 10 月，目睹國民黨軍隊進入台北城的樣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此次遭受空襲的經驗於戰後寫至〈夏の涙〉，《旅の朝》。
1946 年 (25 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 月，從基隆港被遣返回國。 	

	◆ 7月，丈夫黑羽義治因被留用而遲至此時回國。	
1982年 (61歲)	◆ 從日本來到台灣參與基隆高等女學校（今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舉辦的同學會。 ◆ 再訪香港，參觀當年待在香港時所住的宅邸。	◆ 此次返台經驗寫至〈基隆（キールン）は雨だった〉，《旅の朝》。 ◆ 此次香港之旅寫至〈香港旅情〉，《旅の朝》。
1986年 (65歲)		◆ 以「黑羽惠美子」出版《旅の朝》（東京：日本隨筆家協會，1986年）。
2014年 (93歲)	◆ 去世。	